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104 年度選送優秀公務人員  
出國進修及訓練

軟實力作為文化外交策略研究

服務機關：僑務委員會

姓名職稱：專門委員陳永豐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105 年 8 月至 108 年 8 月

報告日期：108 年 11 月

## 摘要

學者奈伊(Joseph S. Nye, Jr)提出國家軟實力概念，成為當代重要外交政策工具，其定義為「透過吸引或說服，使其他國家願意配合，達成國家意欲目標的結果」，目的為爭取國家利益，而主要來源則來自文化、價值與政策。

從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以及孔子學院為設置，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相當程度的運用軟實力(語言、文化、歷史)加上硬實力(經濟資源、軍事)形成巧實力的運用。然而，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主流自由民主體制軟實力，事實上形成二種極端對峙的文化與價值衝突；反觀我國追求的臺灣價值，則與美國獨立宣言與聯合國人權憲章所揭示的平等、自由與追求人民幸福等普世價值一致，臺灣應思考並運用以佛萊雷(Freire)批判教育方式，建構社會公平意識，並擴及國際發展社群。

美國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結合國際發展、社會服務學習，為近代最成功軟實力代表，其有效教育年青學子菁英，形成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公民外交大使，殊值我方仿效學習，俾推廣並突顯我國與普世價值一致的文化與政策。

關鍵詞：國際發展、國際援助、批判教育、參與式學習、國際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美國和平工作團、軟實力、硬實力、巧實力、公民外交、公眾外交

# 目次

摘要	2
第一部分 進修過程.....	4
第一章 進修目的及緣起.....	4
第二章 研究內容方向.....	8
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	10
第二部分 研究摘要.....	13
第二章 外交與軟實力.....	13
第二章 從批判教育認識軟實力.....	27
第三章 中國軟實力.....	44
第四章 公民外交與軟實力.....	56
第五章 結論.....	84
附錄 參考書目.....	91

## 第一部分 進修過程

### 第一章 進修目的及緣起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提出「國家軟實力」（Soft Power），成為外交政策重要概念，軟實力一詞蔚為風潮，國際社會對以文化、觀光及語言作為推動國際交流與外交工作之模式，不勝枚舉，如法語推廣聯盟或法國文化協會、德國歌德學院、韓國文化中心（世宗學堂）、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屋）等，中國大陸孔子學院近十年更以倍速成長，成為國際間不可忽視現象。觀察其中，以語言輸出結合文化交流、教育事業與文創產業，似成為當前文化外交軟實力核心重點工作。然而，各別國家具備軟實力資源與程度均有所差異，西方先進國家以「文化霸權」姿態，可輕易襲捲相對落後國家文明，爰國際社會提出「文化例外」觀念，主張文化產業可排除於自由貿易協定，原因即在於軟實力的目的，亦必須用「國家利益」為評核標準，而各國均日益重視文化的重要性，並以保有自身文化產業為核心國家利益之一。因此，如何盤點本國自身文化優勢並充分運用軟實力爭取國家利益，成為當前國家發展重點工作。

而隨著近年全球華語熱風潮，臺灣憑藉保存中華文化與開放人文、科技環境，實擁有藉華語文教育輸出，擴展文化外交之有利位置與條件。政府前制訂「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102-109）」；並曾提出在海外設置「臺灣書院」向世界推廣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規劃構想，惟相關發展進度相對孔子

學院（課堂）以每年百所進度發展而言，其間差距不僅是資源投入比重，更涉及策略方向、整合規劃等關鍵議題，困難重重。此外，目前中央各單位因所屬業務政策目標多元化導致事權分散，尚未具體建構出完整文化外交統整策略，加上公務預算制度缺乏彈性，導致我國相關機制力量恐有未能達成目標之疑慮。

上述相關文化外交工作，僑委會作為協辦單位均有參與，個人長期擔任海外駐外第一線工作人員，感觸亦深。為期加強相關規劃與執行業務，爰規劃對海外教育體制、國際交流，及以語言輸出作為文化外交策略相關領域與知識作更深入研究與調查，俾有助未來參與政府相關教育、文化、外交、僑務、非營利社團乃至文創領域之整合性工作，並希望能提出語言輸出作為文化外交之具體發展策略與評估機制。基於前述研究目的及緣起，並考量語言與文化存在密不可分內在連結，爰職在出國前便設定以「語言輸出作為文化外交推廣之策略研究」；「國際文化交流政策與管理」為研究方向。惟在進修過程中，逐漸體認到，在研究命題上二項根本缺陷：

第一，「語言輸出」僅為一項文化產業發展，它具有文化特性，但本質仍為一項產業；

第二、文化外交不等同於軟實力，軟實力的定義必須嚴格檢視，方能真正成為外交推展的策略工具。

因此，個人在進修研習過程中，認識到必須對「軟實力」重新定義與釐清，方能掌握文化外交的整體方向與真正意涵，更重要地是避免含糊使用甚或誤用

「軟實力」一詞，導致文化外交目標無從達成，甚至浪費國家資源。因此，個人研究主軸係藉由「教育」與「國際關係」跨學門研究，以外交「軟實力」作為體系架構，通過批判教育理論(Critical Pedagogy)的討論，並以「語言輸出」作為討論起點，擴及討論運用「國際志工學習活動」及「國際發展角色地位」二項策略工具，期望能實質達到增進國家利益的可行性研究。

職於 104 年獲錄取「行政院獲送優秀公務人員 104 年國外進修計畫」，因未及準備托福、GRE 等相關留學資料申請，爰依規定申請延緩一年並於 105 年前往美國丹佛大學進修教育博士。教育博士學位畢業學分計 90 學分，自 105 年 9 月起進修，除於教育學院(Morgridge College of Education)修課外，並於同校國際關係學院(Josef Korbe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進行跨領域研究，合計 3 學年共完成 82 學分課程，尚待完成 8 個論文撰寫研究學分。鑒於社會學科博士學位一般約 4-6 年完成，職規劃返國服務後將持續利用遠距視訊進行論文討論與質性與量化田野研究，預訂二年內完成論文寫作俾取得博士學位。

此外，個人於進修期間，經報備僑務委員會同意，亦於課餘時間擔任 STUF 世台聯合基金會顧問，協助該會辦理「生命教育」計畫及 UNITY 原住民青年海外遊學計畫。

世台聯合基金會係以世界臺灣商會會員為基礎，成立之非營利性國際慈善組織，成立宗旨係以結合全球資源，共同為人類創造出更美好的生活環境為目標，其英文名稱 STUF 分別代表了 Share（分享）、Trust（信任）、United（團結）

及 Family（世界一家），同時以非政府組織（NGO）之身分加入聯合國全球企業盟約（Global Compact），結合社區與企業力量，提供慈善救濟、文化教育、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社會公益活動的規劃與資源，並且鼓勵社會青年投身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公益活動。自 2009 年成立以來，在世界五大洲、26 個國家推展慈善計畫。

為推動北美地區生命教育工程，世台聯合基金會又另外成立世台生命教育學會（STUF Life Education Society），針對所有華裔族群，鎖定八大生命教育主題，透過各項課程及研習活動之舉辦，宣揚生命教育理念，傳遞生命教育真諦，讓生命教育能從教育、生活等各方面實踐。

本人除參與生命教育課程規劃與組織建議外，同時也以該會顧問身分參與 luma 原住民海外遊學計劃，該計劃係鼓勵並甄選台灣原住民學生赴海外遊學，與世界各地原住民交流，開展國際視野，同時進行長達一年培訓課程，每二年並參與美國最大型印第安人原住民青年大會(United National Indian Tribal Youth, UNITY)。

## 第二章 研究內容方向

同前所述，軟實力的定義必須嚴格檢視，方能真正成為外交推展的策略工具。因此，個人在進修研習過程中，逐漸將研究內容方向，全面擴及到以下三個領域，期藉由「教育」與「國際關係」跨學門研究，以外交「軟實力」作為體系架構，通過批判教育理論(Critical Pedagogy)的討論，研議如何透過「國際志工學習活動」及「國際發展角色地位」二項策略工具，達到增進國家利益的可行性研究。三項主軸研究內容方向分別為：

一、教育作為外交政策軟實力工具研究 (Education as a Soft Power

Instrument of Foreign Policy)

二、從批判教育認識國際志工學習活動 Toward an Expanded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ritical Pedagogy

三、美國和平工作團在國際發展角色地位研究 (The Role of Peace

Corp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此外，個人在進修期間修習學分，除教育必修與基礎課程學分外，另包含大量研究方法課程(質性、量性分析與混合分析)，另外亦針對教育哲學、人道教育(Humanizing Pedagogy)、種族與階級教育、民主與權力教育、批判式教育(Critical Pedagogy)、文化回應式教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認同(Identity)、種

族模範 (Model Minority)、國際學習服務(Inter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多所涉  
獵。

另為進行教育與國際發展學科跨領域研究，亦於國際關係學院(Josef Korbe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修習教育與國際發展及國際發展專案系列課程，包  
含國際發展專案設計與監督(International Project Design and Monitoring)、國際發  
展專案計劃管理(Project Management)以及國際發展計劃評估(International Project  
Evaluation)。

## 第三章 心得與建議

### 個人心得

職大學及研究所碩士期間，所學相關領域均為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科，未曾選修教育相關課程，且因從事公職已長達廿餘年，遠離學術領域，重新擔任“中年”學生，初期頗感不適，然而此次獲得千載難逢機會，得以進入丹佛大學教育學院進修，同時又能於同校國際關係學院(Josef Korbe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進行跨領域研究，實感幸運。特別是在進修期間，逐漸對於國際發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課程，產生高度研究興趣，並期未來集中焦點於「如何將教育結合國際發展工作」，原因臚列如下：

- 一、2030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明訂第四項永續目標為「教育品質」(Quality Education)(詳如 p. 59 聯合國永續目標圖)，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並提倡終身學習。然而多數專家學者均同意，「教育」工作串連所有發展中的永續目標，不論是消除貧窮或飢餓、實現性別平等、促進永續經濟成長、減少不平等，乃致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各項永續發展都必須透過適當的教育的方式來實踐。

- 二、軟實力作為外交政策工具，最核心的價值就是意識型態與理念，而意識型態與理念的一致性，最佳的方式就是經由理性溝通的批判式教育來養成。
- 三、國際發展或援助(International Aids)在西方國家已經成為一項專業範疇，國際發展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更已產出「國際發展專案經理人證照」制度(Project 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PMP)。這方面相關專業知識國內尚未普及，殊值於臺灣流傳推廣。
- 四、長期從事國際發展或援助專業人士，不論在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中，均係理想性較高之各國菁英，應成為我國外交政策積極爭取聯結之對象。

## 相關建議

1. 建議外交部研議在「國家合作發展基金會」機制外，仿效美國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成立類似臺灣和平工作團組織，培養國內青年學子具備跨文化溝通協調能力，建立志工服務精神，並聯結全球國際發展組織體系。
2. 鼓勵僑民青年投入及參與僑社事務，培植海外支持我國之新力量，為累積友我軟實力重要資產，建議加強對第二代僑青與僑生經費支持，俾規劃活動增進渠等對臺灣之情感及認同，串連友臺新興力量。

3. 人才培育為國家提升施政績效及國際競爭力之重點工作，職有幸獲得選送出國進修，除感謝政府提供難得機會，更希望相關單位能持續選送公務人才培訓計畫(至少維持一年中期進修時間)，完善輔導追蹤機制，俾能為國家社會貢獻所學。

## 第二部分 研究摘要

### 第二章 外交與軟實力

#### 傳統國家實力定義

在國際政治上，“實力”事實上是非常模糊的概念而難以量化。學者克林(Ray Cline) 提出感受到實力公式為：

Formula1:

感受到的實力=(人口+領土+經濟+軍事)\*(策略+國家意志)

Perceived Power = (Population + Territory + Economy + Military)\*(Strategy + Will) (Popovic, 2011 p. 4)

這樣的公式充其量只能告訴我們傳統上以軍事力為主體的國家實力，更重要地，它忽視了非國家角色作用，特別是在科技革新大幅提升的全球化時代，人口與領土並不能與國家實力成為正比。事實上任何嘗試發展單一性實力指標，註定將會是失敗的，因為權力必須依據在不同架構脈絡下評量，也會因不同領導者而產生變化。當我們在說某一國際成員角色，具備相當實力時，我們必須清楚指出“是誰擁有何種實力？以及運用在那個場域？換句話說，一個政策相關的實力概念，端視在何種脈絡下，何人想作什麼？如何作？在那裏作？以及何時作？”

( who gets what, how, where, and when).

上述權力計算公式，基本係以資源為基礎，下列 2.1 公式便說明“國家實力以資源”為基礎的算式，2.2 則係將“國家實力視為行為結果”的不同看法。

Formula2: Power as Resources and Power as Behavioral Outcomes

## 2.1 POWER DEFINED AS RESOURCES

脈絡架構(Context)

技巧(Skill)

實力 Power =資源 resources > 轉換技巧 conversion strategy >

期望的結果 preferred outcomes

## 2.2 POWER DEFINED AS BEHAVIORAL OUTCOMES

領域(Domain)

範疇(Scope)

實力 Power =影響他人 affect others > 作何事 do something

>用什麼方法 by means (強迫 Coercion,獎勵 Reward,吸引 Attraction)

>達到預期的結果 to preferred outcomes

Nye, J. J. S. (2011). The future of power: It's changing nature and us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rieved from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

第一個公式將國家實力從資源角度分析，我們可以舉中國和印度為例，一般國際稱之為潛在性大國，主因在於它們擁有龐大人口和資源，以及轉換成軍事或

經濟力量的實力，但如何轉換仍需視在何種脈絡架構下，以及具備何種轉換的技巧而訂。

第二個公式將實力定義為“轉換他國行為的能力去產生本國想要的結果”，則比較能觀察一國實際擁有的能力。畢竟，最終外交政策目的結果不必然在於資源的多寡，而在於國家如何使他國達到他期望的結果。

### 現實主義的限制

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是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其認為國家之國際行為是因應國際環境下所作的反應，迄今仍然是外交政策最高指導原則，即便是部分看似運用軟實力的外交政策選擇，背後仍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如奈伊(Joseph Nye)便說過，以美日中三角關係而言，美國如果持續採用冷戰時代後圍堵(Containment)政策，最終三角關係必將形成二對一的敵對局勢，然而 1980 年代美國採用交往(Engagement) 政策，在鞏固與日本的聯盟關係中，同時保持與中國進行經貿與社會往來，確保萬一交往政策失敗，仍然有美日聯盟作為準備。交往政策雖然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經由長期貿易與社會往來，期望和平演變中國發展，但追根究底，其本質仍是以現實主義分析為基礎(Nye, 2004, pp.1-2)。

但國際事實上已因科技資訊發展，產生不同的來往現象，早於 1968 年柯漢(Robert O. Keohane)和奈伊便認為現實主義忽略太多國際互賴的現象，因此提出複雜互賴概念(Complex Interdependence)來解釋歐洲同盟與美加之間互惠關係，

同時，奈伊也針對道德意識與外交關係作出深切反省，在資訊流通與民主化分散權力結構的國際關係中，道德意識(Moral Issues)逐漸在國際權力政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認為文化與理念，與軍事武力一般，是會產生國際力量的。

此外，大規模傷害核子武器產生的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原則，使得傳統戰爭受到限制，因為無人可承受毀滅性後果，但相對地，隨著核子科技的進步與擴散，也使得過去以國家平衡體系為主的國際社會，也必須去平衡可能的恐怖行為，國家不再以土地擴張當作爭取國家利益的手段(Nye, 2004, p. 29)。過去威斯發里亞條約(Westphalia system)體系時代，國家以擴張領土作為獲得經濟利益為主要手段，現今不但可能潛在風險太高，以現今資訊時代經濟利益而言，也不再是依靠土地或人口產生的利益。

以對付恐怖主義來說，美國可以輕易推翻在阿富汗的塔拉班(Taliban)政權，但它只能摧毀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分散在 50 個國家的蓋達基地(al Qaeda)組織，對抗恐怖主義更需要長期的運用文化與價值的軟實力，而非僅止於傳統軍事或經濟的硬實力(Nye, 2004, P. 8)。

國家所具有的影響力經常仍舊是通過“實力”的概念來衡量，因此，不容否認地，實力是必不可少的國際關係中的衡量機制。政治學家同意每個國家幾乎總是在爭取獲得國家最大的實力和安全性，並將之視為核心利益。奈伊將實力定義為“作事和控制他人，使他人能夠做他們本來不會做的事情。”由於國家擁有實力，便具有強迫他國或鼓勵他國的能力，例如人口、領土、自然資源、經濟規模、軍

事力量和政治穩定性。從過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權力都是經過計算，多數是基於軍事上，就一個國家可以使用的資源、聯盟和經濟資源，換算成軍事能力來衡量，即硬實力；而隨著後冷戰時代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現實，全球對權力觀念，以及權力形式和行使的持續轉變，也重新被賦予新意義。奈伊提出討論“相互吸引”或“促進其他國家的結盟”，以及“使得他人擁有自己的偏好”思考，就是軟實力的核心概念。奈伊解釋說，“實力的定義不再是強調軍事力量和征服。技術，教育，和經濟增長，在國際上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傳統衡量硬實力包含地理，人口和原物料資源等等，已經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顯然，國際社會已經從強調傳統的實力指標轉變為其他因素考量，例如技術，教育和經濟增長，這意味著採用不同的方法來調整自己的優先事項，它同時也暗示著軍事行為，基本上已成為不得已的次佳選擇，國家之間更願意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化、體育和意識形態，作為來往工具的憑藉。

## 實力三個面向

1990 年代初，奈伊便認為隨著資訊革命時代來臨與擴張，軟實力概念影響力日益重大。除了區分資源定義的國家實力外，三種與「關係上」的相關面向，也能幫助我們瞭解國家實力的概念。這三種國家關係，分別是「命令他人改變」、「控制議題的能力」，以及「塑造他人的喜好優先次序的能力」(Popovic, 2011, p. 11-12)。換句話說，你可以改變他人行為，藉由改變他人的喜好優先次序，而

非僅依賴利誘或威嚇的途徑，遺漏這個面向定義的實力，將會窄化外交政策的選擇，請也是為何我們必須分析軟實力的原因。。

第一個面向是傳統上實力的定義，1950 年代耶魯學派達爾(Robert Dahl)提出，“要衡量改變他人能力的多寡，你必須知道對手的強弱與喜好，以及你能夠影響他人的方法”。此外，經濟上的指標相對軍事而言，則較為複雜，例如國家單方面拿掉本來給予他國的關稅優惠，也會造成對他國的威嚇。現今兩岸關係中，中國以凍結大陸旅遊團來臺灣觀光方式，就是一種經濟上的威嚇。

1960 年代政治學家 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Baratz 指出達爾忽略另一個面向-“議題設定”的能力，這種能力聚焦在具備設定主題的實力，例如有權力者，可確保無權力者連坐上辯論台的機會都沒有，臺灣被排除於聯合國就是顯著的例子。又如 G8 高峰會，演變成後來的 G20 高峰會，未被允許與會的國家，可能連提出抗議的權力都沒有，這種設定議題的能力也成為軟實力概念的一部分。而到了 1970 年代，社會學家路克(Steven Lukes)指出：理念和信仰亦有助於形成他人喜好程度。以青少年穿衣上學為例，家長可威脅利誘女學生不能穿短裙上學，又或者學校可強制規定穿制服的方式，但學生可能沒發覺的是，學生喜歡穿流行的窄裙上學，其實是受到名牌流行服飾店一連串的廣告行為，路克稱這種為第三面向的國家實力概念(F. p.12-13)。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並非軟實力都是被動、志願性質的，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Stockholm syndrome) 被綁架的受害人為例，也可能是因為創傷而產生同情加害者的現象。

### Formula 3.三種面向的國家實力概念 Three Aspects of Relational Power

#### 3.1 「命令他人改變」

FIRST FACE: A uses threats or rewards to change B's behavior against B's initial preferences and strategies. B knows this and feels the effect of A's power.

#### 3.2 「控制議題的能力」

SECOND FACE: A controls the agenda of actions in a way that limits B's choices of strategy. B may or may not know this and be aware of A's power.

#### 3.3 「塑造他人的喜好優先次序的能力」

THIRD FACE: A helps to create and shape B's basic beliefs, perceptions, and preferences. B is unlikely to be aware of this or to realize the effect of A's power.

獨裁者希特勒和史達林嘗試創造一種無所不能的氛圍來吸引群眾，某種程度這種領導人特質創造了對跟隨者的敬畏，這種吸引力可能是間接性的順從行為，部分學者稱之為公開、隱藏、看不見的實力面向。無論如何，第二種和第三種面向的實力是涉及結構的實力，人類事實上是生存在複雜的文化、社會關係階層結構之中，而結構不僅影響、也限制了我們的行為能力。

有些學者認為區分這些權力或實力面向是沒有意義的，這些本質上都屬於第一個威脅利透的面向，即逼使他人服從的實力，但重點是如果只接受這種單一面向國家實力觀點，則對政策決策者而言，將相對限制了他的決策思考與能力。

第二和第三種面向的協作實力，是比較細微，有助於對軟實力觀念的形成，具備能力而能透過議題設定、勸說以及吸引力使得別人願意作到我想要達到的事，有時候反而有效而且長久。Anrold Wolfers 曾經區分兩種實力，一種是掌控的目標，一種是環境的目標；前者是特定看得見的，後者則是結構性質看不見的，例如促進公開的貿易體系、自由市場、民主或者人權，這是屬於環境的目標 (Popovic, 2011, p. 16)。這些分類，目的都是幫助我們掌握運用國家外交政策的能力，譬如美國在伊朗推行民主，結合軟實力途徑與單獨運用軍事力量相比，前者肯定有效也合理的的多。

此外，在 21 世紀網絡和社會結構也成為相當重要的權力來源，譬如作為傳播的中心，如果你的朋友必須透過你傳話，這樣的傳話角色也能帶來設定議題的能力。心理學家呼應這樣的看法，心理學認為同情和 EQ，比起使用武力、欺騙手段來得有用得多，John Ikenberry 也認為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成為國際機構的中心角色，雖然限制了美國單方面的行為能力，但同時也增加了美國與別人協作共同行為的實力(Popovic, 2011, p. 18)

就政策目的而言，如果能全面觀照並且用反向思考三種面向的實力，將有助擴張政策的選擇與有效性。決策者應優先選擇議題設定與決定喜好優先次序的方法，最後再考量第一個面向，因為顯然地，在資訊時代，第二和第三面向實力的重要性日益在增加當中，也符合多數人的利益。

Formula 4.我們可以從實力行為光譜來觀察軟、硬實力：

硬實力 Hard → 軟實力 Soft

命令→強制、威脅、利誘、懲罰、議題塑造、勸說、吸引←共同協作

Command→Coerce Threat Pay Sanction Frame Persuade Attract←Co-opt

## 軟實力的興起與應用

奈伊在 1990 年代創造了軟實力一詞，但早在 1950 年代後期，透過美、蘇兩國各自盟國的技术援助，便已有軟實力概念的相關國際政策，例如 1960 年代通過和平維持部隊以及美蘇技術援助等，都仍持續在國際社會進行中。

即便傳統現實主義國際政治權力學者莫根索也早在 1970 年代指出，控制與被控制的心理層面國際關係，其實便是指軟實力，奈伊更把中國東方哲學家老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視為一種軟實力的呈現(Magu & Magu, 2018, pp.19-20)。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儘管軟實力（說服力）已成為重要工具，但沒有哪個國家會放棄傳統硬實力的工具，包含軍事能力、經濟生產力以及雙邊/多邊外交。即便是小國也會透過與大國的軍事聯盟，想辦法擴增本身的軍事力量。

奈伊指出三種主要軟實力來源，包含文化、價值與政策。Jonathan McClory 則另外增加政府、外交、文化、教育與科技革新(Magu & Magu, 2018, pp.44-45)。一般而言，軟實力與看不見的因素有關，例如機構權威、概念、價值、文化與政策的合法性 (Magu & Magu, 2018, p. 21)，他進而定義軟實力是採用柔性吸納而非強制的方法，使得他人希冀達到你想要的結果 (Getting others to want the

outcomes that you want- co-opts people rather than coerces them)。換句話說，這種左右別人優先次序與喜好的能力，一般是來自軟性的權力資源，譬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價值或機構力量，以及被視為合法理或道德權威的政策) (Nye, 2004, p. 5)。換句話說，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使得他國願意順從其本國意欲的目標，主要來自國家所展現的文化、價值和政策，以及具合法地位的外交政策。

可被用來產出硬實力的資源，端視在何種脈絡與使用方式下，也能夠成為軟實力的來源，例如一國的海軍實力，可以用來贏得戰役，同樣也能贏得他人的民心與尊重；同樣地，共同選擇行為也能夠用來作為產出硬實力的軟性資源，例如軍事同盟或經濟援助，也會成為軍事威嚇的能力。以中國而言，龐大的經濟市場潛力與表現，使得中國得以掌握控制他人進入市場而產生懲罰的權力，這是硬實力，但也能夠發揮吸引他人市場預期心理，而成為他人模仿對象，這又變成軟實力的運用。

### **巧實力=硬實力+軟實力**

奈伊(Nye)指出，實力同時也涉及到資源，以及轉換資源成為實力的能力，2004年他將「資源轉換成真正想要結果的策略與領導」，稱之為巧實力 (smart power) (Popovic, 2011, p. 8)。因為不希望軟實力被誤用，或誤以為單獨依靠軟實力即可作為有效的外交政策工具，他特別提出巧實力的概念，並且認為不管國家大小，都可廣泛運用巧實力概念，結合軟硬實力工具以達到外交政策目的。例如

挪威僅僅五百萬人口，卻能有效運用和平維護部隊與國際援助建立良好的國際聲名與吸引力。而中國面對「中國威脅、中國崛起」論調，也掌試著用軟實力工具，來減輕亞洲週遭鄰國的恐懼，但這涉及到中國根本上與西方主流意識型態的差異，是否有用，是值得提出疑問與思考的，在第三章「軟實力錯置」論述上，我也會特別提出批評與看法。但無論如何，要作到巧實力的第一步，是必須全盤掌握軟、硬實力的工具政策，並且認清問題的本質，不同程度地綜合運用所有的軟硬工具 (Nye, 2004)P. p.23)。

非強迫性與合情理地使用軍事資源是可以成為國際政治中重要軟實力來源，包含議程設定、勸說與吸引力。即便是極權政府也必須有足夠的軟實力來吸引號召跟隨者來配合使用武力，今日的軍事重心強調的是贏得民心，而國際政治中無政府狀態以及缺乏超越國家主權，使得國家往往直接訴諸於軍事實力，但是隨著時代演變，程度也有所差異，英國外交官 Robert Cooper 便歸納了三個不同時期，包含前工業時代、工業時代以及後工業時代，軍事力量所扮演的不同程度角色。簡單來說，在後工業民主國家之間，武力不再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甚至我們也無法再聯想到會有兩個民主國家間彼此間會以戰爭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互賴的事實使得這樣場景明顯不太可能再度發生(Popovic, 2011 p. 28)，特別是完全使用武力來解決爭端，就道德上與擔憂遭致反擊的雙重顧慮下，國家領導人一般會更謹慎使用武力，畢竟現在與 19 世紀相比，在歷經全球化的規模深度與複雜的互賴關係，全球國際運作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改變，然而不同文明國家之間的衝突，

卻仍然有相當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國際關係學者杭亭頓便認為文明的衝突將主宰未來的國際政治。此外，特別是恐怖組織活動與反恐行為，可能性遠遠超過大規模作戰。但是反恐活動大規模武力衝突，事實上僅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國際政治應該都可當作軟實力作戰，是有關於如何說服與溝通的戰爭。

我們可以細分如何把軍事資源轉換成行為結果，一般我們會以一國人口當作評價敵對國家的最主要依據，一般而言，戰略資源包含軍事預算、軍事基礎設施、軍人人數以及國防工業能力與武器庫存都列入評估範疇，作戰能力當然也是評估項目，但是軍事專家最終也會告訴你，以能力為基礎的軍事評估無法預測戰事的成果失敗與否，因此評估是一回事，實際使用又是另一回事。

軍事能力是可以由三種軟實力面向來評量的：第一，軍事能力可以用來威脅逼迫他國改變喜好與政策優先次序；第二，軍事也可以成為議題設定的工具，而戰爭結束後，最終也必須成立某種機構或機制來善後，因此強國能替弱國設定議題優先次序；第三，軍事能力也可能改變他國的喜好觀感，例如希特勒對於軸心國是產生一定的吸引影響能力。總結來說，軍事實力可以用來第一，實質作戰與摧毀；第二，作為強迫外交政策下的後盾；三、保護承諾，包含和平維護；四是提供許多種型式的協助，相關的軍事訓練、教育以及人道協助，都能夠產生軟實力的吸引力，在美國 21 世紀海上協合戰略，就是把聯合作戰訓練以及技術協助、人道援助當作而戰略之一環 (Popovic, 2011, pp. 41-47)。

總括來說，我們要非常清楚軍事能力是可以用來產生硬實力或是軟實力的，在前述四種軍事行為中，軟硬實力可交互運用，但是最重要的是，軟實力來自友善的行為、行為能力、合法性以及信任，而妥善融合兩項軟硬工具，才能夠被稱作「巧實力」的運用。

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是權力的底層結構，並且能夠決定上層政治附隨組織的運作，經濟實力是硬實力，但運用在議題設定上，則屬於軟實力。冷戰後歐盟以及現成的中國軟實力，都因為經濟力量而隨之加強，龐大的經濟市場與潛力成為吸引他國資金、人才的來源，這也是一種軟實力。Fuller 和 Sondaus 也以美國流行風尚來舉例，他們指出美國必須運用硬實力鞏固國際局勢穩定，但同時在日常生活之中，美國也廣泛運用了美國軟實力，包括電影、流行音樂、速食、流行、主題公園等等來傳播並加強共同原則、價值信仰與生活型態。簡單來說，硬實力採威嚇，軟實力強調吸引；硬實力採阻卻，軟實力則用說服(Magu & Magu, 2018, p. 22)。

## 本章結語

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話語：觀光是軟實力，藝術表演是軟實力，電音三太子是軟實力，華語流行音樂也是軟實力。在現今軟實力已成為一個國家流行語之後，如果我們想充分運用軟實力的概念，吾人實有必要釐清軟實力的目的與用途，並

對「軟實力」重新定義與釐清，以避免含糊使用甚或誤用「軟實力」一詞，導致外交政策目標無從達成，甚至浪費國家資源。因此，我們必須審慎釐清下列觀點：

一、軟實力是外交政策工具，易言之，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爭取國家利益」，除此之外，都非軟實力的應用範疇。

二、軟實力的定義是「透過吸引或說服，使其他國家願意配合，達到國家意欲目標的結果」。

三、軟實力的兩大面向：「控制議題的能力」與「塑造他人的喜好優先次序的能力」。

四、三種主要軟實力來源，包含文化、價值與政策；其他來源也包括政府、外交、文化、教育與科技革新。

綜上所述，一般我們常說觀光外交、文化外交、體育外交等等，不論何種型式外交，觀光、體育、文化、教育都是運用的工具或載具，至於它是不是軟實力，端視它的目的或範疇，如果它的目的是否是為了增進國家利益，且它的運用有助於國家增進「控制議題的能力」與「塑造他人的喜好優先次序的能力」，接著我們才能繼續評估它的效率與效能，否則一味使用軟實力一詞，恐怕均將模糊了國家政策討論的實質內涵與意義。

## 第二章 從批判教育認識軟實力

### 教育與軟實力

如同前章所敘述，外交，觀光、體育、文化、教育等，都是軟實力運用的工具或載具，而軟實力的定義則是「透過吸引或說服，使其他國家願意配合，達到國家意欲目標的結果」，其兩大面向是「控制議題的能力」與「塑造他人的喜好優先次序的能力」，而三種主要軟實力來源來自文化、價值與政策，麥克羅 (Jonathan McClory)則又補充將軟實力來源擴及政府、外交、文化、教育與科技革新。那麼現時現地我們究竟該如何增長本身國家的軟實力？教育可能是最直接的方式與答案，原因在於軟實力主要來自文化與價值觀，而文化與價值的建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教育了。

特別是現今我們正走向一個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文明社會，一種建構在科技與資訊產生的全球力量，快速地改變世界環境成為地球村 (George S. Counts, 1932, as cited in *Understand Curriculum*, p. 799)。考特(Counts)早在美國遭逢大蕭條時期的 1930 年代便認為，現代文明科技與工業化社會造成的社會階級衝突，應該由教育來解決，他強調進步教育運動 (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而教育真正要作到進步，必須首先解放階級影響，公平的面對各種社會議題，並且從現實中去取得一個社群的和諧關係，發展一個全面性社福理論，形成一個人類未來的共識；巴美特(Theodore Brameld)則表達了一個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我們應

該揚棄狹隘地國家偏見轉而擁抱一個地球共同體的世界觀(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 800)。顯然，教育對形塑軟實力的「文化、價值與政策」，是最直接與究竟的途徑與方法，而綜觀世界各國政府，莫不將教育當作塑造下一代未來的基礎方式，因為教育本身是充滿政治性的，我們可以從學校的課程研究，來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 理解課程是政治的教綱：

課程(Curriculum)作為學校教育專屬的象徵代表性項目，我們可以從中發掘教育機制、運作、邏輯、結構與經驗(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16) 。美國 1970 年代便開始了從課程來理解教育的思潮研究，然而課程本身也不應該脫離它的歷史脈絡架構來討論，將課程獨立於歷史脈絡架構來討論會失去意義 (Cornbleth, 1988, p. 85)。我們可以從以下二個理論去理解「課程是政治的教綱」主要意涵：

- 一、重製理論(Reproduction Theory)：Boweles and Gintis (1976, as cited in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p.244-245)認為學校是在超社會結構階層下運作，而決定它的階層是依據社會的經驗基礎。傳統上，馬克思主義即認為經濟基礎決定的超社會運作的結構。這種相對應 (correspondence) 的原則關係，是我們理解「課程為政治的教綱」所要優先認識的。
- 二、意識型態(Ideology)：意識型態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看待世界方法，集結主張的複雜綜合體，以及各種不同的社會實踐方式、儀式或視為理所當

然的代表產物 (McLaren, 1989, as cited in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245)。而所謂的主流文化就是那些反映統治階級喜好的社會運作和代表事物。

三、此外，我們也必須注意隱藏的課程 (hidden curriculum)，類似的例子如同升旗典禮或是穿校服的規定等等，這種隱藏課程影響了學校教學以外的行為和知識，綜合這二種顯性和隱性的課程便聯合決定了學生行為如何服從權威、順從主流意識型態和道德準則(*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 248)。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因此極權專制統治階級，視教育為重製意識型態的工具，只希望掌控課程的方式，塑造服從奴役階級，畢竟對獨裁者而言，他只需要服從者，而不是教育出一個理性思辯者。

我們也不要忽略大眾文化所能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媒體。在一項針對 1930 到 1965 年 Ellsworth(1991)對教育紀錄片的研究中，她發現某些教育紀錄片鼓勵學生形成對某學術專業的忠誠，特別是這些紀錄片傳達了某種父權主義的合理化說法，而學生也因而產生了認同。然而，是不是教育能夠完全左右民眾的意識型態？以品格教育來說，美國教育週報(*Education Week*)曾經引述 麥貝爾(Justin McBrayer, 2015)對於教師教導學生品格道德觀念的看法，他積極探討教師自身因個人因素和許多難以避免的先入為主立場，均會對學生分辨是非觀念知學習有所影響，因此大量重製是不可能的。

但不論如何，教育與政治、權力是脫不了關係的。顧得門(Goodman, 1992,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257) 指出美國個人主義文化也是一種意識型態，美國透過學校課程，將強調自我滿足、工作勤奮和以物質崇上的觀念加諸於美國社會，甚致強迫加諸於美國原住民印第安人，這種意識型態強調個人、資本主義至上，從歷史上是傷害了美國原住民文化。幸好到了近代，美國教育界也開始了反思，顧得門認為在教育上其實是要強調互賴的，當強調社會需求而加諸訴求道德意識的同時，我們也應該保持學童的個人自體性、自我信心與選擇教育的權力。因此美國教育界後來也提出和諧課程( *Harmony curriculum*)，主張給予學童一定的自由，公立教育不應該以教師為核心，而係以組織體系為核心；而和諧教育關鍵點在於它尊重個人主義精神的本質，所以即使是美國的開放式和諧教育，本身它也是政治的教綱，只不過這個教綱是傳揚美國自由開放與民主的意識型態與價值體系。

### 批判教育的濫觴

從重製到反抗：吉諾斯(Henry A. Giroux, 1980)認為一項課程最大的任務就是證實能夠長期一貫地自我批判與反省的過程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 252)，反抗理論事實上後來就是所謂的批判理論。學者埃波(Apple)更主張重製和反抗其實是彼此聯結的。埃波和威斯(Weis)，都覺得霸權無法完全控制人類，特別是

文化相對自主性領域，使得即使在專制極權的國家裏，仍然有機會在學校進行較有意義的改革。

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魏克思勒(Wexler)認為，除了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物質重製或經濟決定上層社會外，我們也應該重視文化的影響。法蘭克福學派便主張學校就是文化重製的場所(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247)，但它更強調教育要建立批判性社會意識，該學派認為批判性社會意識超過既存意識型態的重製力量，從而支持獨立思考並且能夠保持自由地選擇替代方案。該學派主張教育應替社會意識保有種子，這個種子在 1980 年代超越了機械式重製理論而形成反抗的力量 (a concept seed for the move away from mechanistic reproduction to resistance,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 248)。

1985 年後美國社會逐漸開始強調尊重種族與性別平等的課程，同時認識階級造成的歧視。課程教學應該成為“可能性的語言”，教育者必須成為塑造改變的知識份子，而非是熟練的技師。卡爾森(Carlson) 提出民主進步的論述，教育可促成全體人類趨向民主進步，但他也同時指出，自我反省對話是不容易教的，特別是在美國強調個人主義觀點下，如何對目的、自我建構以及創造文化自我反省是不易的。賽門(Roger Simon)提倡「可能性的教學法」，這是一種為促成達到“尚未作到但有可能作到的未來環境與自己”而努力的教學法。從麥卡倫(Mclaren) 到吉諾斯(Giroux)主張與想法，都已經開始論及批判教育的核心，那就是強調必須發出“聲音”(voice)，批判教育提醒教師所有的論述都是根植於歷史

與文化之中，發出的聲音不管是用文化的觀點或是背景知識建構，這些聲音都應該被拿來教導形成群體的共同經驗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 263)，因此，鮑爾斯(Bowers)認為，一個崇尚個人自由與平等價值的社會，必須確保個人能夠學到如何運用這些價值的溝通能力；一個共享持續維持的社會必須經由發聲溝通來達成，同時個人的主觀性是在允許每個獨特個體保有自我保狀況下，交互與其他人溝通，從而使得每天社會得以正常的運作(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p. 274)。

## 國際發展與教育

教育一直是現代社會的基礎，也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便強調教育本身增強了人們得以自由享受經濟發展生活的機會，教育教會人們理性選擇，也使得市場機制得以發揮 (Moraiji, 2017)，但也因為如此，殖民者利用教育來掌握經濟利益與權力，這使得早期所謂全球化是處於南北的對立關係，是殖民者奴化被殖民者的經濟過程。

爾後這樣的關係有了轉變，真正的全球化源於二次經濟和政治解決方案衰落的一系列特殊情況，這些情況以一套國際金融協定和機構為中心，統稱為布雷頓森林協定。這時新自由主義者樂觀的認為“超全球主義”正帶領著我們進入一個真正的“全球時代”，這其中隱含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及新形式的全球治理文化與公民社會的出現，按照這種觀點，我們應該目睹民族國家的滅亡，但在

這種趨勢下，我們看到部分國家抗拒全球化的發展，一些國家、社會和社區在全球秩序中日益陷邊緣化危機（Tikly, 2001）。

馬金森認為，全球化正在不可逆轉地改變著民族國家及地區的既有利益關係，它正在為教育政治創造新的潛力，同時也帶來局限性。它對教育政治的影響是複雜的……教育已成為全球化的主要媒介，並成為其孕育的孵化器。全球化不僅抑製或改變了舊的教育方式，還創造了新的方式（Tkly, 2001）

戈德史密斯聲稱，所謂“發展”的概念，使第三世界進入了西方貿易體系的軌道，為西方的商品和服務，創造了一個不斷擴大的市場，同時也為其工業製造獲取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因此，他認為，“發展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而它引領第三世界國家前進的道路是一個被人深惡痛絕的過去”（1997：69，引用於科薩爾，2005）。但是，殖民關係也建立了落後國家的教育體系，成為一種特定的帝國形式的終結工具，但是帝國利益和全球影響仍透過教育持續到現在（Smith，1994：268，Kothar，2005）。

沒有人會否認教育是國家發展或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例如，殖民主義時期，教育是殖民者用來統治殖民者的工具，同時也是進入公眾的主要服務手段（Tikly，2001年, p. 164）。教育可說是一個過程或工具，西方殖民主義者將教育視為殖民主義手段，但同時教育也被視為被壓迫者，可以找到出路的方法，這就是佛萊雷（Freire）創建批判教學法的原因。教育可以用來促進年輕人融入當前系統的

邏輯並實現整合的一種工具，它也能成為自由的實踐，只要民眾建立批判性能力，並能有創造性地應用處理現實生活問題，進而改造社會（Freire, 2000，p.34）。

實際上，教育是教與學的兩個過程。雖然佛萊雷（Freire）認為教育不是政治化進程，但同時它也不能從政治中分離，其中的轉變和連結，就是他雖發明的批判教育學。所有的人，包括教師、學生、家長和政策制定者都必須意識到人類獨立意識；批判教學法強調被壓迫者應當建立一個批判性的認識，以便採取行動對付現實的壓迫元素。佛萊雷強調，知識是通過對話構建，相比之下單純上對下的傳統教育方法，學生通過教師所教接收的信息，佛萊雷（Freire）稱其為“填鴨灌輸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這樣的教學方式，既不能增強學生的思考能力，也不能參與民主進程或挑戰政治體系。此外，佔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教育體系，往往會創造一種“沉默文化”，向被壓迫者灌輸消極、沉默和壓抑的自我形象，這就是何以殖民地可以永久維持機制的方式和原因。因此，批判教育學，第一個重點是識別與清楚認知到統治階級如何試圖塑造意識形態，藉以維持不公平的政治體制，同時企圖結合經濟手段剝削被殖民人民（Brown, 2015）。

弗朗茨·範農（Frantz Fanon，1968,1984）提出所謂的“民族意識陷阱”。範農認為脫離殖民主義並不意味著解放，“民族意識”往往無法實現自由，因為其目的主要是被殖民的成為“資產階級”的願望，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用獨裁統治代替殖民統治。他認為，即使獨立後，殖民主體仍會在心理上在內部進行殖民化

(Rizvi等人, 2017)，這也是為何建立自我認知意識如此重要，它目的不是複製殖民統治關係，而是民主公平社會。

珍妮佛·拉維亞(2006)，在她的論文“希望的教育學”主張教育是不可避免地與歷史、政治和文化聯繫實踐下的經驗，而這樣的過程佛萊雷指為

“Conscientization”，這是一個意識覺醒的過程，是每個人都天生擁有的，通過參與批判性意識，而對社群產生責任感與清楚的社會意識。

### 批判教育：改變的可能

在迅速發展科技和全球化成為日常生活的同時，作為共享生活的地球村一員，我們應該思考人類社會如何與所有進步保持同步，特別是對於那些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受壓迫者而言。由於教育被視為可持續發展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批判教育試圖通過被壓迫者的哲學和教育學的視角研究權力、知識和教育之間的關係。正如巴西教育哲學家保羅·佛萊雷（Paulo Freire）五十年前指出的那樣：“受壓迫的人民越多，窮人掌握的主要語法就越能表達其在反對不公正鬥爭中的聲音”。批判教育其實是可以追溯到馬克思主義思想，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進步力量，通過引入資本主義關係使人民受益（Parthasarathy，1994），因此在原始社會中，推動世界前進力量是由市場引起的，換句話說，馬克思也同意資本主義原則，但是，資本主義也造成了階級對立關係，最終將導致種族統治或階級衝突。批判教育學源自這樣的推論，但同時也指引了方法，相信透過教育能喚起人們普

遍存在利他的意識，這樣的哲學思考與邏輯仍然適用於21世紀時代的當今社會。

總而言之，權力、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結構、壓迫的關係與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都相互包圍，而批判教學法就是打破權力上下關係的答案。批判教育可以看作是一種教學方法，主要側重於認識不平等問題，從而倡導採取積極的社會變革行動，以便實現更美好的世界。至於這種批判教學法如何運作？我們必須認清以下兩個命題：

首先，被壓迫者應該能夠要找到造成壓迫的原因。

其次，我們必須相信變革的力量，即被壓迫者可以通過反思和行動來解放自己與社會（Freire，2017）。

換句話說，批判教育學的方法是通過對話式問題擺在教育來挑戰和轉變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同上，p.55）。

我們可以舉美國原住民為例，教育美國原住民認識本身的歷史，係基於批判種族理論，其借鑒了 Leilani Sabzalian 博士（2015）提出的框架，強調我們如何強調優勢並承認原住民身份的複雜性，更重要的，如同佛萊雷（Freire，2017）所提倡的，首先批判教育學應該能夠找到壓迫的根源，然後我們必須相信被壓迫者可以通過對話性問題擺正教育來解放自己（同上，p.55）。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我們可以先通過學習美國關於血淚之路(the trail of tears)和寄宿學校的歷史，來認識原住民印第安祖先的歷史，通過類似的痛苦和鬥爭，他們可以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並且可以團結起來打斷那些暗示原住民自卑的敘述，並承認原住民固

有的主權、文化，或者是多重和雙重國籍身份認同。藍道(Rendon, 2009) 在批判性希望教育學的基礎上，提倡一種社會參與的靈性，它強調具有批判意識，並表現出與人合作的愛心和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努力治療人們並為他們提供希望(pp. 9-10 頁)。因此，試圖採用這種批判性意識方法來找到他們的部落聲音，尋找原住民族力量的例子，並找出屬於他們的觀點。

### 參與式發展教學(Participatory) 做法案例研究

參與式教學方法源於佛萊雷的批判教育學理論，與被壓迫者的意識增強能力有關 (Gardner, 2015, p.7)。馬丁和格里菲斯指出教師的職責是要提高人們心靈的意識能力，教導學生透過行動提高自己對社會、環境的意識。換句話說，關鍵的知識和技能，必須在自己成長生活的社會中學習與實踐，這種教學法使得參與學習者能夠探索思想和建構自己的知識 (Brown, 2015)。

2002 年在印尼 Sumbawa 島有一個參與式發展失敗的教師培訓案例研究：

“綠色革命的幽靈：失控的印度尼西亞農村地區發展經理警告一位計劃協調員，在勸告參與者改變其結構狀況時，不要採取過激烈的舉動和言行(Welker, 2012, p.396)。這種教學上的衝突不僅限於公司贊助的活動，在印尼腐敗的政治關係更是造成殖民關係的元凶，這使得參與式發展教學，幾乎不太可能成功。因為完整的訊息揭露，鼓勵參與者建構在地化的知識是參與式教學成功的必要前提。在此案例中，教師培訓的目的不在於社會變革，而是安撫農民和國際環保團體的公

關活動。這次培訓目的其實是在改變參與者的信念、能力和身份，並鼓勵推廣環保意識和增加農業生產為工作目標（Welker, 2012, p.389），但是，最終在印尼這場參與式發展教育計劃並未成功。通過布朗(Eleanor J. Brown, 2015)提出的以下標準來評析本案例，我們可以較深入了解參與式發展教育失敗的原因。

參與式發展教學必須替學習者創造一個安全，得以自己表達意見與觀點的空間，在 Sumbawa 案例中，培訓活動只是一個短期培訓班，只能帶給參與者短暫的影響而不是永續、持久性的變化（Welker, 2012）。此外，該培訓活動主辦單位係由礦業公司發起的，而跨國礦業公司正是勾結當地政府造成剝削關係的主要禍首。有些專家也認為正規教育，如執政者創造的學校完間，其目的是維持其統治正當性，因此，或許透過非正規培訓教育，或許是參與式發展教學可以發展的途徑，即便在印尼的案例是失敗的（Jarvis, 2002）。

另外，產生批判性思維的意識，是發展參與式教育的重要關鍵，這通常開始於認識到主流媒體資源通常不願意提供的訊息。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於能夠獲得正確的訊息，從中學習者才能了解現實中的矛盾結構要素。而不是“灌輸填鴨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被動的接受統治者資訊與指示，然後重複殖民的剝削關係(Brown, 2015)

“我的觀點並不是要否認印尼農村衰退的經歷，但也不應該拒絕教育所可能帶來鼓勵人們的追求改變的能力”（Appadurai, 2004）。教育確實體現了對特定種類變化的期望，這些變化是根據對現代化的發展視野來想像的，儘管發展願景

似乎在嘗試在塑造社會成長的軌跡，但這一過程既非既定，也不能視為理所當然。

不論批判教育或參與發展教學法，我們對於國家發展過程的分析重點，應該轉移到以「個人認知」為中心的挑戰，在應對資本市場機制下，提出對當代理想世界的價值與選擇（Moraiji, 2017 年）。這也使得參與式或體驗式學習概念非常重要，它是從共同學習者的經驗中學習，邊做邊學，這意味著教育工作者還必須準備挑戰自己的觀點，以實現思想敏銳的批判性思維和自我真誠的對話（Brown, 2015）。

另外，參與式學習關切的重點在於特異性，而不是普遍性。這種特異性意味著個人和團體將根據地理，歷史和文化背景不同，而對世界有不同看法。因此，在南北跨文化學習的背景下，對知識的定位不僅需要訪視多種觀點，而且還需要瞭解各種觀點形成的特殊情境，同時認識到知識是社會建構的，是獨立也是彼此相互聯繫的。泰勒（Taylor, 2007）呼籲更加關注“背景的作用”，這是理解社會的結構及發展跨文化能力的第一步，也是突破殖民發展關係的第一步。

## 普世價值與文化

美國各州教育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對於事實(Fact)和觀點(Opinion)定義如下：“事實”指的是：「對欲了解對象的某項可經測試或證明為正確的事物」；至於“觀點”則指涉：「某人怎麼想、感覺或相信的東西」。因此，如以

上述定義標準來說，世間所有認定的價值觀都只能稱之為觀點。比方說「自由是普世價值」，或是「人生而平等」，這些嚴格說來都是推論得來的觀點言論。教育如果迫使兒童同時接受彼此矛盾衝突與不同的觀點，並認知到這世界並沒有所謂完全「事實」的觀點，那麼到底我們能夠教育孩童什麼？又如何能夠養成學生的正確價值與道德觀？這不禁讓教育人員深思一個問題：怎樣的教育方式更接近理想的民主教育？是直接輸入片面觀點的價值觀？還是應該讓學生去花時間深思和驗證何等觀點更接近事實？

不論如何，家長與社會大眾普遍還是相信學校應該承擔起教導基本價值與道德文化的任務與義務性，大部分的學童是到了學校才開始見識到一個更廣大的世界，學習到和從前家中認知迥異的「事實」，例如不同種族的審美觀，或者是對性向、同性戀的看法等，即便學校的教師在教學時也會在某種程度地表達自我觀點而影響學生的價值觀，但是真正會造成對學生觀念顯著影響的，通常是絕大多數人所支持的所謂主流「事實」，這個時候學校的角色，應該是提供學生更寬廣的空間去思維、討論與批判。

美國教育週報的報導認為，雖然學校並非像麥貝爾(McBrayer)所說的那樣因為教導學生先入為主的觀點而會全然影響學生道德學習，但是該評論也主張教師應該盡量避免灌輸，而是應該引導養成學生思考的能力，教師應該教的是一種態度，一種不輕易接受任何論點的態度，學生應被教導去挑戰權威、去質疑的勇氣，並且能有意識地處理輸入的知識，如此一來，無論老師甚至家庭的自身立場

為何，孩子都不會是被動遭驅趕的羊群，而是能夠握有自主性地去選擇、判斷。換句話說，基本價值與道德文化要教，但是不應只是陳述範例或注入觀點，而是應當營造開放討論空間，從聽取學生想法到發展其認知理解，並養成開放尊重學生自主判斷的態度與能力。

但什麼是基本價值與道德文化？

相信在不同的文化、宗教與種族，以及國家、地區之間，我們很難歸納一個所謂普世價值與道德文化，但我們都應該會承認，與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思潮，其實一直在塑造一個主流普世價值，這在美國 1776 年的《獨立宣言》中得到了總結：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上帝創造者賦予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美國《獨立宣言》，1776 年 (Hazelton, 1912)

《獨立宣言》事實上是體現教育最終目的的願景，根據麥克雷教授 (Paul Michalec)，教育的目的是改變學習者的情感，智力和精神生活。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知識的本體論(Ontology)層面。我們可能會問自己，轉變的最終目的是什麼，答案應該就是完成人類的共同普遍價值與基本的原則，那就是普世價值。有人可能會認為普世價值是有爭議的，是難以達成共識，然而，普世價值只是基於這樣基本前提，即人類社會只能在人們能夠部分壓制自身利益，實行利他主義，並互相幫助的前提下生存 (Haidt, 2012, 第 298 頁)。而佛萊雷提

出的批判教育，基本想像也是主張人類社會必須建立在平等與自由的原則之上，這些普世價值符合《獨立宣言》，也是符合人類社會長久利益的。

## 本章結語

2015年9月25日聯合國的大會通過了17項「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最關鍵的一項目標就是「品質教育」：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和促進所有的“終身學習的機會。而在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教科文組織）出版的小冊子中，清楚地說明了教育本身是目標，也是實現所有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手段，換句話說，教育不僅是可持續發展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實現永續發展的關鍵工具。

在本章中我們試著討論國際發展與教育的關係。國際發展作為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最主要的互動關係，其與教育的聯結，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如何透過批判教育或參與式教學，來改變落後國家面對全球化未來的想像。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思考哪種教育符合主流普世價值？哪種教學是可以為人類創造美好的未來？

美國獨立宣言所揭櫫的普世價值：「人類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生命、自由與幸福」，已經在近代二百年的美國歷史中，成為美國意識的代表，也是其軟實力的來源，這種價值、理念，深植在美國的文化，也反映在美國的國內與外交政策之上。同樣地，批判教育也是在解構不平等的統治階級關係，為人類

生而平等的價值而奮鬥。依據上述的邏輯推論，我們也可以肯定批判教育對塑造平等關係的教學效果，符合並有助於美國獨立宣言所揭櫫的普世價值。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檢視臺灣所具備的軟實力？

再一次重新復習軟實力的定義，軟實力為透過吸引或說服，使其他國家願意配合，達到國家意欲目標的結果，而三種主要軟實力來源來自於文化、價值與政策；其他來源也包含政府、外交、文化、教育與科技革新。

我們可以試著盤點臺灣所具備的軟實力來源，一般而言，臺灣擁有相當科技革新能力，與多元包容及傳統的中華文化，亦或者民主政府等等，但這是否足以成為臺灣外交關係軟實力的根源，端視我們運用在何種範疇與如何使用之上。

如果我們集中焦點在軟實力主要三項來源-文化、價值與政策中，我們或許可大膽論斷，「臺灣價值」同樣承襲美國獨立宣言所揭示的平等價值而形成的意識型態，這樣的文化、價值與政策，可以 2019 年 5 月 17 日我國所通過的《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為代表，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法國家，其中所展示的文化、價值與政策，便是我國軟實力的最大資產，它不僅聯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流自由主義思潮，也彰顯了臺灣正視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意識型態，殊值我國持續維護推廣並廣為運用。

### 第三章 中國軟實力

中國對外軟實力的推廣，毫無疑問就是以大張齊鼓的孔子學院為代表。從 2004 年開始，中國大陸運用其外交及經濟之優勢，並藉著全球持續加溫的中文熱，輔以中國大陸龐大商機為誘因，並以中外學術合作設立孔子學院（課堂）模式進駐全球各大校園，其藉由提供免費教材、獎學金、教職人員旅費、薪水，介入各地孔子學院師資雇用考核、教師選拔，乃致議題操控，15 年內來全球 158 國家已設置 535 所孔子學院和 1 千 1 百 34 所孔子課堂(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由於成長迅速，經費投入龐大，已造成廣泛影響與正反批評。我們可以試著從其背景與發展過程，一窺其軟實力的思維與運用。(資料來源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Hanban) . (n.d.).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hanban.org/>.)

#### 孔子學院成立背景與功能

1987 年 7 月中國大陸成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並設立常設辦事機構-「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後改稱「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隸屬於國務院教育部之下，2000 年起規劃並以德國歌德學院為借鏡，以「普及漢語教育、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理解與友好」為宗旨而創設孔子學院，與歌德學院不同的是，其發展模式係與在地使領館、與大學院校及文教機構等合作，設置海外據點，並藉由國外孔子學院與當地主流大學或

教育機構合作運作，廣邀海外學習漢語者，另於中小學合作設置孔子課堂，加強青少年交流與聯繫。

依「孔子學院章程」孔子學院總部設於中國大陸北京，並設立理事會，由主席、副主席、常務理事和理事組成，其中主席 1 名、副主席和常務理事若干名，理事任期兩年，可連任 1 次。理事會設總幹事、副總幹事，總幹事為孔子學院總部法人代表，由常務理事擔任，人選由中國大陸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提出建議，報國務院批准；第一屆理事由孔子學院總部聘任，以後選舉產生或按孔子學院成立時間順序輪流擔任，其餘由「中」方合作機構代表擔任，由總部直接聘任。

孔子學院主要功能，包括漢語教學、培訓教師、漢語考試、文化交流與中國研究五大項，具體工作則涵括各層面，如開展多媒體及網路漢語教學、舉辦當地長短期中文培訓、承辦「漢語水平考試」和漢語作為外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合作開發當地漢語教材、開展學術活動和中文競賽等

2004 年「漢辦」首批選出中國大陸北京語言學校等 17 所院校，與國外大學或漢學中心合作，同年 11 月第一個孔子學院於韓國首爾掛牌成立，2007 年 4 月於北京成立孔子學院總部，之後平均以每年超過年 100 所新學院或課堂速度創立，成長幅度遠超過具 60 年歷史，全球僅 140 餘所之歌德學院。<sup>1</sup>

---

<sup>1</sup> 註：歌德學院成立於 1951 年，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全球從事文化活動的一個非營利機構，負責在德國或國外促進德語方面的學習，參與國際間文化上的合作計劃，目的在提供資訊，

其分布全球狀況可從下表觀察：

洲別	國家或地區	孔子學院	孔子課堂	學院（含課堂）合計
亞洲	36	127	113	240
非洲	46	61	44	105
歐洲	43	184	323	507
美洲	26	143	558	701
大洋洲	7	20	96	116
小計	158	535	1134	1669

## 孔子學院軟實力推廣模式

孔子學院（課堂）近年來快速成長，並深入世界各洲各國之主要城市，已在全球形成綿密組織體系。2013年11月漢辦在華府成立「孔子學院美國中心」，為孔子學院第一個在海外設立的推廣整合機構，目的為促進美國各孔子學院與孔

---

介紹德國文化。目前歌德學院在德國有13所、在德國以外有128所分院。其它國家的類似機構有：法國的法國文化協會，英國的英國文化協會，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義大利的但丁學院，葡萄牙的卡蒙斯學院等。

子課堂間之資源共享和信息交流，同時與美國媒體及各界溝通合作，深入推動中美文化交流，共同提升在美漢語教學質量。

2014年5月12日，孔子學院拉丁美洲中心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成立，許琳出席揭牌儀式中指出：「成立拉美中心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總部對拉美國家的靠前服務、靠前支持，通過中心把孔子學院的資源、項目、資金，更及時更全面地帶給拉美各國孔子學院」，足見中國大陸建立孔子學院漢語品牌，設北京為總部、分置地區中心，再深入各國主要城市的全球組織體系已漸次成形。

此外，為了掌控學術發話權，堅持所謂的中外合作，是孔子學院重要策略原則，其標榜「文化二人轉」：「我方主導、民間運作、中外合作、互利互贏，中外高校、中小學結對辦學，中方院長、外方院長攜力推進，融入外國主流。」

以美國為例，中國大陸趁「世界華語熱」之勢，先期不僅以龐大資金挹注美國 AP（高中先修課程）中文教育，參與美國教育體系在外語教學之推動，同時也積極參與全美每年於11月舉辦之外語教師協會（ACTFL）年會，2008年起漢辦更以大量資金挹注，由亞洲協會及美國大學理事會於每年4月辦理全美中文大會（NCLC），參與之對象除中文教師外，尚擴及美國教育部官員、各地學區校長、督導等，華語文學術地位與影響力已逐漸提高並有凌駕各項研討會態勢。

同時，全球各地孔子學院營運類型漸朝多樣化發展，如：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孔子學院係第一所網上孔子學院、英國倫敦商務孔子學院係針對商務人士學習漢語所開設，2009年另於美國馬里蘭州成立中文教師資格證書與發展中心，2013

年成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孔子學院，為華府地區聯邦政府機構、國際組織、外交使節團及經貿商業人士提供中國語文及文化相關課程。另據悉，漢辦對與各地成立之孔子學院，均視情形簽訂不同的合作協議，並對重點戰略地區及知名學府給與較大彈性與優惠，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 5 年 1 百萬美元贊助、美國芝加哥大學 20 萬美元開辦孔子學院費用、史丹佛大學 4 百萬美元贊助，顯示孔子學院爭取與知名學府合作以提高影響力，因此在經費、合作規範上均保持因地制宜的高度彈性。

在教材發展亦同，漢辦建立起從幼稚園到初中的華文教材體系，修訂《中文》、《漢語》主幹教材，完成多語種中國歷史、地理和文化常識課程翻譯與發行，並加快各地在地化教材和多媒體網路教材的研發，僅僅 2013 年就已向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 250 多萬冊華文教材。此外，亦建立培訓、考核、認證三位一體的華文學校教師培訓體系，組織研發華文教育教學大綱，製定華文教師從業水平測試標準和華裔青少年華文水平測試標準。

同時孔子學院亦開展「新漢學計畫」，面向全球招收研修漢學外籍博士，申請成功者可獲得每年近 3 萬美元資助，進入中國大陸一流大學學習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另同時昭示「4 類型「示範孔子學院」，包含注重師資培訓；研究型孔子學院；特色型孔子學院，如偏重中醫、商務等；及偏重語言和職業技術培訓。

孔子學院章程中雖明確揭示「孔子學院作為非營利性教育機構，其宗旨是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了解，發展中國與外國的友好關係，促進世界多

元文化發展，為構建和諧世界貢獻力量。」，惟究其目的實為藉由中國大陸崛起之勢，利用漢語教學為工具，達到推廣文化軟實力之目的。

中國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韓方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表示，孔子學院是推介中華優秀文化、傳播中國好聲音、展示和諧中國軟實力的重要平臺。在促進孔子學院未來發展應做到以下三點：第一，進一步更新對外傳播理念和話語體系，弱化官方色彩。在未來的發展中，孔子學院不論是在組織運行還是在教育教學方式等方面應儘量地淡化其官方色彩，承擔起公共外交的責任，以更加國際化的行爲方式傳播中國軟實力。第二，以更大的力度推動漢語教學與中華文化傳播的在地化。在對外傳播中要注重強調中華文化、當地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共通性，以外國人聽得懂的方式來傳播文化。第三，孔子學院的設立要注意均衡發展。作為中國軟實力傳播的重要平臺。

## 軟實力的錯置

### 一、軟實力非宣傳

1950 年代東西冷戰背景下，吾人習慣將敵對陣營不同的意見，都當作國際宣傳戰來看待，即使到 2006 年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也曾把美國反恐戰爭當成文宣戰來宣傳，他忽略了軟實力並非文宣戰，更何況廣告文宣界的至理名言：「如果你的產品不佳，再好的廣告也救不了你的產品」。而事實上，軟實力不僅與宣傳不同，與國際政治傳播也不一樣(蔡政修)。

孔子學院標榜為「推廣漢語為基本任務的非營利性社會公益機構」，強調「官督民辦」方式，爭取與世界各國合作機會，並以孔子為名降低政治色彩，惟實質上，孔子學院等同漢辦海外機構，隸屬於中國大陸國務院教育部，經濟學人引述中國大陸前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說法，直言孔子學院是中國大陸海外宣傳重要機構，與其他國家設立文化推廣組織不同的是中國大陸非民主國家，所謂文化推廣僅是依附在國家政治目的下的活動。

## 二、與西方主流價值的根本衝突

軟實力是一種懷柔招安、近悅遠服的能力，而不是強壓人低頭，或用錢收買，以達自身所欲之目的。目前中國大陸將語言文字、文化等作為國際交往的媒介，係「軟實力」的一種體現，但在層次上與真正的「柔性權力」仍有一段距離，因為中國大陸的「軟實力」尚未到達價值的層次，也未能得到普世的認同。學者 Edward A. McCord 於外交季刊為文指出，過去七年間，美國人民對中國大陸好感調查，降低了 7 個百分比，顯見不必過度誇大孔子學院宣傳功效。特別是在思想一言堂箝制學術自由方面，這種軟實力推廣方式與西方主流思想嚴重抵觸。

孔子學院章程總則第 6、7 條款規定：「不得與中國有關法律相牴觸」、「不參與與孔子學院設立宗旨不相符的活動」，然而臺灣問題、西藏問題、疆獨、回獨、六四天安門事件、法輪功、人權問題、中共高層鬥爭均為禁忌話題，孔子學院要求教師以「不談政治」迴避，並加以闡述「中國」觀點，已明顯侵害學術自由，美國北卡大學取消達賴訪問、達賴並被迫在澳洲雪梨大學校園外演講，滑鐵

廬大學 (Waterloo University) 孔子學院動員學生為中國大陸對西藏鎮壓行為辯護、McMaster University、Tel Aviv University 都因反法輪功活動產生爭議，中國大陸政府領導人並明示在中國大陸大學課堂應禁止討論 7 種議題，包含普世原則、新聞自由、中國共產黨歷史錯誤等，可見孔子學院意圖操控思想議題。

## 中國軟實力特色

1977 年後的中國課程教育強調社會主義，並且支持共產主義獨裁統治的政府，以及所謂四個基本原則的馬列主義思想影響，但 1989 年天安門事件，顯示了並非所有學生都能夠接受這樣的思潮，2019 香港學生民主運動同樣也是反思的例子。Jing Lin (1993) 在後毛主席的教育紀錄了 1978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教育的不同觀點，但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使得較強調經濟民生的教育又重回共產領政的思潮，幸好，中國與世界教育的往來並沒有終止。我們可以這樣說，中美關係事實上是相當程度地影響中國的教育，特別是交換學生計劃，但這種意識型態上的矛盾也在 1990 年代強調共產意識型態與現代中國所必要的全球化教育不時產生 (U. p.814-815)。但很明顯地，中國目前以強調愛國主義共產獨裁經濟開放為主軸，獨裁式的市場資本主義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形成一強大特色，與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思想，有根本上的衝突與對立，然而高速經濟發展卻又保持獨裁統治的結果，卻對中南美洲政府、第三世界國家產生相當號召力。

此外，中國軟實力在東南亞也有一定的號召力，人文與務實主義是東南亞國家知識份子看待中國和 21 世紀中國文明的兩大特徵 (C. p. 3)。而且，研究中國在東南亞是不同於其他地方的，因為華人在東南亞國家普遍有悠久的歷史與角色。過去在東南亞殖民歷史中，一般西方殖民者視東南亞華人為有用的合作者但同時是危險的族群，因為東南亞華人基本認同母國中國文明，因此在東南亞國家獨立過程中，華人扮演了不同角色。而東南亞華人移民一般是透過私塾教育、小說、戲劇與雜誌留保得華人文化特色。這種文化傳承也包括了漢學 (Sinology) 的研究，這種漢學在無形中轉換成不同方式與中國文化上的聯結。如新加坡透過戲劇具體而微地呈現某種與中國的聯結，又如馬來西亞獨中教育體系，使得馬來西亞華人儒家思想文化得以傳承；又像菲律賓學術界，在漢學研究、中華教育以及華僑研究間取得一個平衡，這像種種不同的型式巧妙以一種間接方式連接出不同的華人文化 (Chineseness)。總括來說，華人知識份子傳統，使得華人意識始終以不同方式在東南亞國家社會間留存下來 (Yeoh, 2009)。

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國家運動，挑戰了東南亞國家跨越國家界限的國族認同意識，而這個運動也象徵著「僑胞」成為住在「國外的華人」，而由於冷戰時期，民主與共產世界的對峙，東南亞華人社群在 1990 年代前聯結臺灣多半是因為正統中華文化的因素，但這對當地東南亞國家也產生民族國家認同的威脅，而使得僑胞必須在避免傾中或傾臺的兩難中作出選擇，例如馬來西亞大學最後就在這種避免選邊的狀況下，選擇了非華人 Wolfgang Franke 去領導該大學首創的

漢學研究 (C. p. 5)。最糟的狀況發生在印尼，印尼反華風潮一度嚴格禁止中文語文學校設置，使得印尼華人語文傳承出現斷層，漢學也隨之付之闕如。在華人高達 8 成的新加坡，為避免共產主義與建立民族國家意識，也有意地遠離漢學研究。而東南亞華人社群為了在當地社會立足生存，相當程度運用了務實主義的特性，多半強調儒家文明如何融入東南亞文化而形成的特有文明，既不同於東南亞在地種族，卻也不同於傳統上的華人文化。

根據 Ngeow 和他的同僚研究，華人文化的特色是多面向的，而這種華人文化的傳承係經由傳統語文、神話小說戲劇，以及宗教與祖先祭祀等方式 (Chih-yu Chih. p. 8)。但這種具備共同華人文化但強調不同特色的華人移民，相當程度減輕了當地國的擔憂，如新加坡就用融入西方文明來突顯與其他東南亞國家華人族群社會的不同，因此新加坡採行英文教育，而馬來西亞則發展了獨立中學教育體系。而越南又發展了一套不同的模式，在越南研究漢學的多半是越南裔而非越南華人，從早期越南文學中，華人文化甚至形成一種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運動的思想來源，越南漢學在古典文學中採納了具華人文化的課程，而形成越南對抗殖民主義侵略的理由。但在 20 世紀初，當越南面對現代化的需求時，儒家文化就被某種程度揚棄了，但畢竟儒家文化證實是可長可久的，領導越南獨立的胡志明也自己聲稱是華人文化的愛好者，許多越南人在 1950 年後到中國求學，雖然因為 1979 年中越戰爭而擱置，但 1990 年後又隨著中國掘起而興盛了起來 (C. p. 10)。一般而言，在東南亞華人文化訴諸在地化，其本質並非抵抗，而是同化，事實上在幾

個層次上，東南亞華人文化展現了不同特色，在文明上，華人文化串連並且超越了國界，即便因國家衝突，仍然作為恢復與中國關係的一項聯結；在種族上，儒家文化強調同化而非分離，因此仍夠在保有華人社群特色的同時，又不會侵害他人而融入當地社會。因此，有關華人文化的研究因為細分成漢學、中國研究，以及海外華人的研究(C. p. 12)

## 本章結語

再一次複習三種主要軟實力來源來自於文化、價值與政策；其他來源也包含政府、外交、文化、教育與科技革新。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加上龐大人口、土地與資源，在經濟上形成強大貿易實力，其廣大的市場具備成他國產生絕大吸引力，於是從經濟硬實力產生經濟吸引的軟實力，這使得許多跨國企業，甚至國家願意配合中國的政策，這是其強大的經貿軟實力。

第二，以人文與務實主義為基礎，中國長久歷史發展的儒家文明與大中華思想文化，也對東南亞華人後裔，包含全球僑胞，產生相當軟實力吸引力。

第三、中國共產黨強調經濟開放為主軸，獨裁式的市場資本主義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形成一強大特色，在高速經濟發展的結果，加上一黨獨大的政權統治，也對中南美洲政府專制獨裁政府、第三世界國家產生相當號召力。

而從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以及孔子學院為設置,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相當程度的運用軟實力(文化歷史)加上硬實力(經濟資源)形成對他國利誘、吸引和說服,並使其他國家願意配合,達到國家意欲目標結果,這是一種巧實力的運用,某種程度是成功的,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中國軟實力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主流自由民主體制軟實力,這樣二種不同的文化、價值以及政策,不僅隔隔不入,甚至是根本衝突。中國知識份子嘗試以中國人文與務實兩大特色,淡化東西方價值衝突的危機,但是,在兩陣營截然不同的軟實力思維下,必然有一決勝負的可能,但決勝不應該以硬實力解決,以應以追求平等與和平的軟實力論斷,否則就會落入軍事衝突解決的霸權爭奪結果,顯然這又與人類朝向進步發展背道而馳,非我們所樂見,而這也是我們應該加強以教育為手段,在全球推廣具普世價值的原因。

## 第四章 公民外交與軟實力

### 公民外交

現代國際社會觀念起源於 1643 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國家主權為基礎的談判外交就此成型，然而這樣的國家間關係忽略了许多層面，而事實上即便在傳統外交體系中，在王室間、國家領導間、甚至紅頂商人之間個人關係的互動，也有許多私有領域影響整體外交關係的例子，特別是到了近代的多層次互賴關係，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組成份子之一，也因此公民外交 (Citizen Diplomats) 概念逐漸興起。

另一個類似的概念是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它是指政府用來動員資源與他國公眾溝通或吸引其民眾的工具，奈伊特別區分為二種，一種是緩慢的文化文外媒介，例如藝術、書籍和交流；另一種則是快速的資訊媒介，如廣播、電影、紀錄片以及網路媒體等，迪蘭尼 (Delaney) 也強調公共外交應該擴及包含個人與非政府團體。換句話說，應重視公民外交在公共外交領域所能扮演的角色，雖然，公民外交係從事與政府一樣類似的工作，但它被用來特別指涉非官方的管道與團體。博納德 (Bernards) 也特別推崇公民外交對解決衝突紛爭的作用，她認為一般民眾可以在和平解決紛爭上扮演重大傳達、感知與接受的角色 (Magu & Magu, p. 9)，特別是公民社會服務外交，以美國和平工作團為例，和平工作團員基本上從事與政治無關的社會服務工作，但它又是政治性的政府所派遣的，揭櫫的工作目

的就列在和平工作團的核心目標之中，某種程度而言，政治派遣的民間和平團隊，在邏輯本質上似乎矛盾，但這的確是目標崇尚的國家外交政策工具。

因為公民外交直接涉及人民與人民之間的聯繫，這種模式更適合奈伊提倡的權力的另一面向，即軟實力的運用，這與命令他人去做的硬性或命令性力量形成對比。由於軟實力是涉及到使得他國的偏好與利益與本國的偏好與利益相一致，這種共同協作(Co-Optive)力量源自文化和思想上的吸引力，以及對國際制度與規則的認同。當然，軍事力量仍然是無政府國際體系下權力的最終形式，但在國際互賴的體系中，對於現代國家來說，使用武力變得更加昂貴，且長期來說無法產生益處，而反觀國際援助或國際發展，則成為國際社會相互扶持的一項重要國際活動，其目的包含：(葛傳宇，國際對外援助新趨勢與台灣模式，p.129)

1. 戰略動機：基於政治利益、意識型態及軍事考量。
2. 商業動機：以援外為手段，開發海外市場與商機，如中國一帶一路。
3. 人道動機：對貧窮或天災人禍之救援。
4. 補償心態：如 1972 年後日本政府援助中國以取代戰敗補償金行為。
5. 共同利益：如美國援助墨西哥俾防制非法移民等目標。

## 國際發展

國際發展或國際援助較全面性的進展，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不論是美國對歐洲援助或對民主同盟陣線國家的援助，或者是西方國家對前殖民地國家，如非洲、中南美洲新興獨立國家的援助，都持續在進行中，然而一直要等到 1990 年代開始，國際發展才逐漸成為一個專業領域，而於此同時，隨著全球化時代降臨，國際發展也加入了許許多多的民間組織與非政府慈善團體(國際發展合作的概念與實務，第二版，2007)。一般而言，國際發展援助可分為兩種態樣(葛傳宇，p.131)：

- 一、雙邊架構(Bilateral Aid)：單一受援國與另一受援國(包含多國)的施與受關係，馬歇爾計劃即是由美國單邊協助歐洲 16 國的援助發展計劃。美國開發總署(USAID)為範例。
- 二、多邊架構(Multilateral Aid)：多指涉透過國際機構執行的援助計畫，如聯合國開發署(UNDP)及亞洲開發銀行(ADB)等，另在多邊架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世界銀行及其主要合作夥伴國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等等，均是國際合作發展中重要成員。

就目標而言，2030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彰顯示了“國際發展”所努力與希冀達成的成果與方向，值得我們審慎檢視，這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如下：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
4. 以國際發展扶貧、環保、確保品質教育、實現性別平等、永續能源、促進經濟成長。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6. 確保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7. 確保所有人都可負擔可靠、永續及現代的能源。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
9. 建立良好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的不平等。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管理森林，終止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化的喪失。
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
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圖：2030 聯合國永續目標



## 美國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

二次大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事實上已具備軟實力概念，爾後的美國對日本援助也成重要的範例，即使美國傳統上仍以權力和軍事作為國際體系互動準則，然而民間的交流和政府間持續互動，“軟實力”事實上已成為顯學，甚至變成一個流行語，但似乎也因為如此，國際政治學界並不當它一回事，而任憑一般人隨便誤用，雖然在外交政策辯論中，軟實力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但由於缺乏充分研究與論證，使得軟實力策略迄今未能成為美國對外外交政策的重要戰略組成部分(Magu & Magu, pp. 48-50)。反倒是美國和平工作團，在歷經六十年的運作，意外的成了一個成果豐碩的軟實力政策特例，而和平工作團事實上就是結合國際發

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或國際援助(International Aids)領域，融合教育與學習服務(Service-learning)理論，所成就的美國外交政策軟實力的典範，當我們談到公民外交，以國際志工活動影響國際外交行為，最佳的範例就是美國和平工作團。即便美國和平工作團志願者(Peace Corps Volunteers, PCV)不同其他民間團體私人、遊學團等志工團體，它與英國海外志願服務(Volunteer Service Overseas, VSO)一樣，經費支持都是依靠政府預算、訓練與派遣，但一般仍將視之為民間大使。

### 美國和平工作團的起源

為慈善目的進行社會服務工作有長久的歷史，特別是美國，1933年總統法蘭克福羅斯福即提倡公民保護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和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志願服務。1960年美國國會也通過 Point-4 青年團，以軍人薪俸提供青年前往他國從事技術服務工作。爾後在冷戰時期，美蘇對峙，國際體系形成二大聯盟，蘇聯派出技術團到盟國，特別是非洲國家，提供技術援助，為了反制蘇聯，美國也開始了派遣技術援助團的想法。1960年10月參與競選美國總統的約翰甘奈迪首次提出建立和平工作團的想法與競選政見，等到他當選總統後，在1961年3月他正式實踐承諾簽署了10924號行政法案建立和平工作團。1961年9月22日國會通過和平工作團法案(the Peace Corps Act)，並且宣佈這項政策是為了促進世界和平和國際友誼，Searles 指出，《和平工作團法案》是“通過和平工作團，

向有關國家人民提供社會服務，青年志願服務者願意在一定條件下服務，藉以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滿足他們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工作標榜利他主義，不以實現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但要幫助他人以良性，無威脅的方式服務。”

三大核心宗旨在創立時明示如下：

1. 幫助有關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滿足技能訓練的需求

To help the people of interested countries and areas in meeting their needs for  
trained workers

2. 幫助受援服務國家人民，增進對美國人的了解

To help promo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s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s  
served

3. 幫助美國人增進對世界其他人的了解

To help promo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peoples on the part of  
Americans

和平工作團的核心價值(

- A. 志願者福祉：保障每個志願者的安全，保障以及身心健康是該機構的首要任務。其優先事項包含：
- B. 質量和影響：和平工作團追求服務工作質量的改進，以加強計劃效能，同時保持全球影響力。

- C. 對國民服務的承諾：和平工作團尋求擴大美國人社會服務的機會，通過志願服務彰為他人服務，同時幫助他們的國家。
- D. 多元化和包容性：和平工作團積極支持具包容性文化，如同美國主流價值一般，尊重我們所服務的國家的多樣性。
- E. 基於證據的決策：和平工作團使用高質量的數據和證據，集中資源聚焦於機構優先事項，實際實地改進問題，並促進制度學習。
- F. 創新：和平工作團利用創新的方法和技術，來解決永續性問題和面對新興業務的挑戰，並力求促進當地發展。

另外我們再從最新的「和平工作團 2018-2022 年戰略計劃」觀察其戰略目標：

#### **戰略目標 1-建設地方能力：**

通過加強地方社區和個人的能力，促進地方發展。訓練有素的志願者服務，是以當地和社區為基礎的。和平工作團志願者致力於協助在地國個人，團體和社區合作，並促進當地發展的能力。其基本構想是通過志願者的社會服務，使得當地建設工作，當地社區和個人能力條件得以改善，而美國人民則受益於更加穩定，繁榮與和平的世界。

#### **戰略目標 2-與世界分享美國：**

通過在當地生活和工作的志願服務者，增進對美國人的了解。志願人員通過日常生活互動，能夠增進當地人對美國人的了解。。在他們的兩年的服務中，志願人員與世界分享美國，透過這種互動，志願者還可以了解有關當地社區的更多

信息，與當地合作夥伴建立信任，藉以加強他們的服務工作。易言之，志願者是美國在世界各國社區中最有效的親善大使，特別是在缺乏與世界互動發展或跨文化交流組織的區域，透過與志願者互動的結果，當地個人和社區獲得了更完整的全球信息，增進對美國的了解，並更願意與美國人交往。

### **戰略目標 3-將世界帶回家：**

通過志願服務人員，藉由分享他們在和平工作團的經歷，提高美國人對其他文化和全球問題的認識和了解，同時在他們服務的兩年期間，志願服務者學習當地語言、習俗、傳統和價值觀。志願者通過互動分享經驗，將世界帶回家，更重要的，通過和平工作團支持的計劃，與當地個人和社區進行互動，其結果加深並豐富了美國人對其他國家，文化和民族的認識和瞭解。通常志願服務者，在結束國外的任務返回美國後，仍然持續或關心相關志願服務工作，並繼續從事公共服務，這促進了整體美國的公共利益。此外，志願人員通過在海外的經驗，發展語言，跨文化技術和創業技能，這使他們具備為 21 世紀的工作能力，他們將這些技能帶到了公共和私營部門，與他們分享全球經驗和觀點，這也相當程度的建立了更具競爭力的美國勞動力。

和平工作團志願者的作用是幫助人們自助。但“幫助人們自助”是什麼意思？工業化國家的傾向於將國際發展視為一個理所當然的結果，不管是健康、教育、住房、收入等。假設某些國家無法獨自實現這些目標，和平工作團便成為改善他們生活，幫助他人生活的一種志願服務活動。然而服務者必須意識到「發展是一

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果」，因此，整個服務事實一個學習過程，參與服務者，同時學習並發展技能、知識、信心以及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由於發展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因此它有時會痛苦地經歷著不同的歷程，但它也提供並擴大了滿足社會基本需求和實現願望的機會。

因此，和平工作團的意義不僅在於對他國提供服務，我們必須也從教育與學習的面向來觀察。作為一個和平工作團服務者，渠同時擔任了六種角色(Role of the volunteer in development, pp. 2-5)

1. 學習者 Learner
2. 改變的媒介 Change Agent
3. 共同訓練者 Co-Trainer
4. 共同促進者 Co-Facilitator
5. 共同計劃人 Project Co-Planner
6. 心靈導師 Mentor

二年的服務工作期間，有效增進了國與國之間不同人民的互動，但重點是我們又如何保證這種互動能夠轉化成為對美國的支持？

根據一項綜合採自美國國務院 USAID (Green Book),美國國務院聯合國投票行為 (Voting Practices at the United Nations),相關國家投票行為 (Erik Voeten and Anton Strezhnev's Dataverse Network, s3n variable),以及 Dreher and Sturm UN 投票行為資料，在 75 個個案的量化調查研究中，顯示了經由和平工作團的公民外

交活動，以及在地接受援助服務國家的外交政策上，兩者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傾向上與美國保持相當一致性。公民外交是解釋在上述研究中受援助國在聯合國大會投票行為與美國一致性的重要因素；公民外交係數在八個模型中的七個模型中具有統計顯著性，這是一個可靠的發現，換言之，研究證實如果他國是公民外交的接受者，他們更有可能在與美國投票取得一致性。當然，西方國家即使非公民外交接受國，他們也經常與美國投票保持一致性，這是因為西方國家與美國的主流民主自由意識型態輸出同源，兩者是不相衝突的((Magu & Magu pp.81-82)。

但為何是之如此？外交政策中的菁英理論(Elite Theory)和途徑可以作為一個有效的說明與解釋，菁英理論認為在外交政策過程中，菁英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年輕的發展中國家(p. 139).在和平工作團歷史中，最特別的案例就是秘魯總統 Alejandro Toledo，秘魯是一個將近 3 千 2 百萬人口的南美國家，在 1962 年開始，接受了多達美國和平工作團總共近 3170 人次的服務，在 1964 年時值青少年的 Toledo 與和平工作團的志願服務者 Nancy Deeds 與 Joel 有了密切的接觸，他們教導 Toledo 瞭解外面的世界，Toledo 也因此有機會在 1965 年獲得了獎學金前往美國加州舊金山大學讀書，後來更在史丹佛大學深造獲得兩個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然而 1970 年秘魯指控和平工作團在當地從事政治活動，因此取消了與和平工作團互動，一直到 2001 年 Toledo 獲選為秘魯總統，Toledo 公開感謝和平工作團改變了他，而他也成為了“和平工作團總統”稱號。2002 年 Toledo 總統更與美國布希總統共同見證與承諾，秘魯將朝向民主與均福體制，以改善人民生

活為目標，同時在 30 年後重新接受美國和平工作團赴秘魯服務。秘魯的案例證明了公民外交能透過民眾與社群互動，是可以產生長遠的影響力的。雖然與和平工作團互動接觸，最終成為總統的案例似乎有點極端，但有許許多多學生，後來因此透過和平工作團的教育，最後到西方世界留學，成為當地菁英的例子則是屢見不鮮。根據統計，將近五成的民眾表示，透過和平工作團的接觸，他們相當程度的改變了對美國的看法並且趨向正面，但不可否認地，也有百分之 23 的受訪民眾表示，並沒有因此改變原先對美國的觀感((Magu & Magu p. 145)。批評者認為和平工作團是美國霸權文明的代言者，甚至認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爪牙。另外也有人認為，和平工作團實際並沒有替當地國造成什麼改變，僅僅兩年的服務，只是滿足美國上對下的基督造福世人的想像，文化的不適應與衝擊，並沒有帶來兩國之間實質的好處。

此外，和平工作團員清一色缺少有色種族也是被詬病的一個原因，2014 年統計只有百分之 33 申請和平工作團服務應徵者，以及百分之 25 的和平工作團員入選者為美國有色種族，其中又只有百分之 7 是黑人或非籍美裔血統，這樣的參與程度，似乎坐實了部分人士對和平工作團的指控，只是給有錢白人小孩一個有趣經驗的夏令營(Magu & Magu, 2018, p. 150)。

然而，不可否認地，根據和平工作團員的調查，事實上是成千上萬的案例透過與他們的接觸，改變了當地國社區的生命，例如教導母親更好的衛生習慣，如洗手、煮開水，或其他有助於上學的健康兒童，數以百萬計的其他故事雖然顯

得微不足道，但確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對當地社區的貢獻，我們更不能忽略了對志願服務者產生的教育影響，在公民中脫穎而出服務並成為外交官、公務員、醫生，或者國際志願者，並且加強了他們的國際競爭能力與適應力，同時也學會了包容。

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國家仍然持續用傳統硬實力工具，包含軍事能力、軍事結盟、傳統的雙邊和多邊外交關係、投資與對外貿易，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等方式來發揮外交影響力。然而在後冷戰時期，軍事能力雖然仍然扮演核心角色，有限度的領土擴張已經在國際戰略間漸漸失去吸引力，過去傳統地緣政治邏輯下，國家實力的擴張有賴土地資源的掌握，戰略地位能夠帶來決定性的影響，但是科技力量的快速崛起，掌握經濟主導的控制權遠超過領土擴張所能夠帶來實質的國力增長，這樣的變化事實上已經發生。

和平工作團在某種程度上，提供的是人員和人力，而不是外援，這與外國援助的結果不同，後者的目標是著重經濟發展和減輕苦難，這比直接安置公民外交官的程序，以及提供現場技能，培訓和其他形式的專業知識，更難達成預先設定的目標，因為投資和重點是人力和技術能量，如果接受外援援助國家本身有良好經濟發展的能力，則外援多半會成功，反之，則非常可能會淪落成貪污政權的工具。

多軌外交學院(the institute for Multi-Track Diplomacy, IMTD) 歸納了九種公民外交途徑，包含政府、專業往來(包含人員訓練、貿易投資)、多國合作、民間

參與、教育(包含研究與訓練)、社會運動(activism)、宗教、經濟援助以及公民傳播。美國和平工作團可說是結合第四軌民間參與、第六軌社會運動以及第八軌經濟援助的公民外交，但更重要的，它通常與第五軌途徑-教育緊密結合(Magu & Magu, 2018, p.5)。

根據研究，有四項結論是可以肯定公民外交可以有效的外交策略工具(同上, pp. 162-175)：

一、提供另一項外交途徑與手段：對美國而言，除了傳統的軍事方式與經濟捐助方式外，公民外交提供另一個影響他國的手段。

二、公民外交有其重要性：公民外交擔任雙重角色任務，包含協助社經發展與支持外交政策。

三、公民外交也會成為對國家主權的威脅：部分國家，例如俄國與埃及拒絕和平工作團的協助，事實上也說明了公民外交所具備的成效，否則不會把它視為對國家主權的威脅。

四、公民外交僅是軟實力變數選項之一：公民外交具備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但它只是軟實力的變數選項之一，軟實力仍然必須綜合各種變數來一起評量。

軟實力原則包括公民外交和對等交流，已經慢慢成為美國傳統的外交支柱(Magu & Magu, p.4)，也因此對和平工作團的支持及國會經費援助，始終居高不下。歷經六十年的運作，相關工作仍然獲得朝野一致的支持，例如第 111 屆美國參議院通過 1382 號法案，其增加預算目的在促進及擴展 21 世紀和平工作團工

作，以迎向 21 世紀(2009-2010)。但反對聲音也不曾停過，有人戲稱和平工作團是政府替有錢小孩資助的假期營隊，但在一項高達 11,138 人的調查研究中，其中有百分之 82 的和平工作團員認為和平工作團成功的達成組織設定的目標，特別是第二項核心目標-幫助受援服務國家人民，增進對美國人的了解

(Magu & Magu, 2018, p.5)。

## 本章結語

和平工作團起源於美國總統約翰甘奈迪的信念，他認為美國青年能夠協助外國發展技術能力，同時增進外國瞭解美國，也幫助美國人認識世界各國。這樣的信念造就了和平工作團的成立，同時也成為最佳的公民外交範例。

法國拿破崙和 (Napoleon Bonaparte)曾表示世界只兩種力量，一種是刀劍，一種是精神，長遠來看，精神力量最終將戰勝刀劍。詩人雨果(Victor Hugo)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強過軍隊，那就是理念，而講求理念的時代已經到來(Magu & Magu, p. 172) 社會公義背後的驅動力來自於深信“人類都是群體的一份子”這樣的信念，即每個人都是人類的一員，而不論他們之間有何差異，這就是達賴喇嘛所說的同情心與將心比心 (Rendon, 2009 年, 第 91 頁)，而美國和平工作團具體呈現了這個理念並將之行動化。

美國是獨一無二的強權，在軍事上，它所花的經費是其他之後廿個國家的加總，它的經濟力量也居於全世界第一，但它最大的力量來自於它同時也是意識型態的帝國，它的影響力來自於對民主自由體制的信念。

和平工作團的成立，部分來自對反戰主義思潮以及社會正義的趨使，同時，和平工作團更成為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抗共產主義在第三世界漫延的外交戰場。但這些歷史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民間大使，喬治(George)指出和平工作團的最大成就：我們送和平共同團志願服務者到世界各地去教導他人，結果他們學習到更多寶貴的東西，這群「甘奈迪孩童軍」二年服務回國後，成為成年人，並且對美國在世界的地位與價值，有了更清楚的認識(Magu & Magu, 2018, p. 8)。

從 1960 年代開始迄今，有超過 22 萬和平工作團志願服務者在超過全球 140 個國家服務過，2017 年一年有接近 7 千個青年服務者在非洲、拉丁美洲、東歐、中亞、加勒比海島國、中東、太平洋島嶼等 64 個國家服務；2014 年的年度預算是 3 億 7 千 9 百萬美元，每年並以 2 千 3 百萬美元比率持續增加中。百分之 40 的服務是在教育項目，健康領域佔百分之 24，其餘分散在環境保護、社區經濟發展、青少年發展等項目(Magu & Magu, 2018, p. 9)。

總結來說，和平工作團代表美國，派遣最優秀和最聰明的美國青年到國外去解決全球人民的迫切需求，志願服務者在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或者低度發展中國家的基層工作，以開發永續解決方案，應對農業、社區經濟發展、教育、環境、

衛生和青年發展方面的挑戰。通過他們的服務，志願服務者獲得了在地的文化理解，並終身致力於社會服務，這使他們能夠在當今的全球經濟中取得成功。

在國際發展領域，和平工作團將志願服務者當作是，一個綜合學習者、改變的媒介、共同訓練、合作以及共同計劃和精神導師的複合角色，這種多重角色的扮演，使得志願服務成為最佳的學習管道，施與受者都受到莫大的恩寵，更強化了對社會服務的利他理念(Magu & Magu, 2018 p. 3)。

因此，在學習與導入美國和平工作團的模型之際，我們也必須深入探討兩項與和平工作團有關的研究理論：「國際發展專案管理」與「國際志願學習服務」理論，以下分別介紹這兩項理論與研究簡單說明。

## **國際發展計畫與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PMP)**

在近代的聯合國發展計畫(UNDP)隨著國際發展演進，有了不同的著重焦點，從 1960 年代早期開發中國家只希望接受金錢援助，且集中第三世界國家，到援助區分民主與共產兩大集團各自運行；1970 年代發展中國家援助大幅下降，主因在於石油危機造成國際金融崩盤，而當時的援助計劃多半是採中央集權管理，認為應該把援助國視為發展模範，換句話說，就是把援助國的發展模式原封不動地移植到接受援助國；1980 年代援助行為經常造成第三世界國家貪污政權的腐敗，形成惡性不良循環，因此要求結構性調整開始發聲；1990 年代認為援助國

與受援助國應該形成合作關係，並且強調參與與社會改革；一直到 2000 年後，重視受援助國參與程度並要求當地政府與社群設計與實踐援助計畫，使得國際發展工作能夠在地化並永續發展。

從上述對國際發展觀點的轉變，也導引著相關的理論模型不斷研發，而成為國際發展的一項專業領域，而其中的複雜度，我們可以衣索比亞(Ethiopia)為例。衣索比亞是全世界前十名接受最多國際援助的國家，在全世界人類發展指標中它排名 187 個國家中的第 174 位，每年接受援助金額大約 20 億美元，然而超過一半的國際援助計畫是小於十萬美元的，以金額來說的話，小額援助大概只佔了百分之二。如果援助計畫是小而美，那也沒什麼不好，但是援助計畫必須受到督導與管理，以國際發展援助體系來說，每年大概有 1 萬 5 千個援助計畫在 54 個不同國家間進行，在某些熱門的受援助地區每年就要接待至少超過 20 個訪團，當地公務員要產出 2 千 4 百個援助報告來應付這些援助團體(aid, p. 28)，大家都窮於應付官樣文書，卻找不到時間執行援助計畫。

另外，在整個國際發展或援助的領域，光 2011 年 35 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OECD)就捐助達 1 千 3 百 40 億美元，另外再加上 125 億的人道援助，這尚未加上未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其他國家，包含巴西、中國、印度、俄國、伊朗、以色列、南非和土耳其等，另外個人捐助也高達 46 億美元，更有許多私人及慈善組織捐款無從計算。藍道爾承認，國際援助金額龐大，體系複雜，很難有一項

完善的機制去監督發展計畫的進行，我們只能說“國際發展極其複雜，失敗在所難免(Ramalingam, 2013, p. 33)”。

2007 年社會瞭望(Social Watch)統計預估，以現在進步的速率，全球孩童接受國小基本教育的比率，中東要到 2036 年才能達成，2079 年沙哈拉非洲國家才能作到，要完成聯合國 2015 年預設的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面對複雜的發展中國家環境，如何更有效率執行國際發展，應該是國際組織、國家政府以及學界、志願參與者共同的願望。

國際發展或援助(International Aids)在西方國家已經逐漸成為一項專業範疇，國際發展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更已產出「國際發展專案經理人證照」制度(Project 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PMP)，美國開發總署(UNAID)、世界銀行都發展出不同的設計、監督與執行管理機制。

一般而言，國際發展專案可以下列 4.1 循環圖顯示其作業模式：

1. 發起階段
2. 計劃階段
3. 預估階段
4. 執行階段
5. 完成/評估階段
6. 影響評估階段

其中可區分為三項發過程，包含從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屬「國際專案規劃與初評」；第四階段屬「專案執行」；第五到第六階段則屬於「國際專案評估」。

圖：4.1 國際發展專案循環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規定在第一個「國際專案規劃與初評」工作必須完成「預備設計計畫」報告(Preliminary Design Plan, PDP)，以及「專案初評報告」(Project Appraisal Document, PAD)。「預備設計計畫」報告需包含七大項目：

1. Preliminary project purpose 初步專案目的
2. Plan for engaging local actors 結合當地成員計畫
3. Plan for conducting analyses 執行計畫分析
4. Plan for considering possible use of G2G (if applicable)可能的政府對政府工作規劃
5. Preliminary estimat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USAID funding 經費來源預估
6. Project design schedule and estimated cost 計畫時程與花費
7. Activities scheduled for concurrent design (if applicable)預先設計與工作時程

「專案初評報告」則包括計畫目的，架構、發展計畫成員關係、計畫描述、其他資源、總結分析、管理與執行計畫、監督考核計畫、財務計畫以及其他相關計畫。各項資料均需完備，並有充分敘述說明。

在「專案執行」過程，則必須包含計劃整合管理、計劃範圍管理、計劃時間管理、成本管理、品質管理、公關管理、溝通管理、風險管理、採購管理。同時在時間序列上，又分為開始、計劃、執行、控制、結束五階段，各階段均在不同時間需注意不同細節(如圖 4.2 專案執行時間序列)

圖 4.2：專案執行五階段及所需知識領域

# Process Groups/Knowledge Are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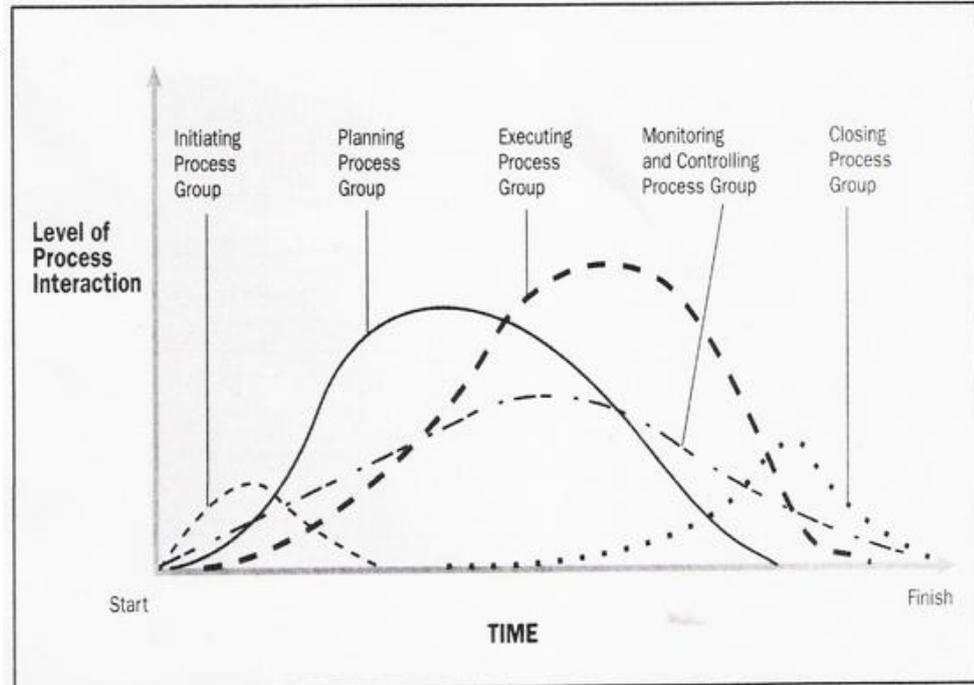
	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ng	Controlling	Close
Project Integration Management	Develop Project Charter Develop Preliminary Project Scope	Develop Project Management Plan	Direct and Manage Project Execution	Monitor and Control Work Integrated Change Control	Close Project
Project Scope Management		Scope Planning Scope Definition Create WBS		Scope Verification Scope Control	
Project Time Management		Activity Definition Activity Sequencing Activity Resource Estimating Activity Duration Estimating Schedule Development		Schedule Control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Cost Estimating Cost Budgeting		Cost Control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Quality Planning	Perform Quality Assurance	Perform Quality Control	
Project HR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Acquire Project Team Develop Project Team	Manage Project Team	
Project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s Planning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Reporting Manage Stakeholders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Planning Risk Identification Qualitative Risk Analysis Quantitative Risk Analysis Risk Response Planning		Risk Monitoring and Control	
12. Project Procurement Management		Plan Purchases and Acquisitions Plan Contracting	Request Seller Responses Select Seller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Contract Closure

資料來源：PM4NGOs

圖：4.3 專案執行時間序列

# Overlap of Process Groups

PM4NGOs  
p. 25



在最後一個國際專案評估，亦必須徹底檢視執行從開始到結束過程，作為計劃檢視、過程管理與事後責任歸屬等相關議題的探討，甚至作計劃完成後十年、二十年追蹤成效等。專業評估要求繁複，相關程序與內容可參考以下網站：

GAO at: <http://www.gao.gov>

Evaluation at the World Bank: <http://ieg.worldbankgroup.org/>

Evaluation at the UNDP: <http://www.undp.org/evaluation/>

Evaluation at the USAID: <https://dec.usaid.gov/dec/home/Default.aspx>

USAID mobile apps: <http://www.usaid.gov/results-and-data/mobile-apps>

上述相關有關國際發展資料規定及對專案的要求，都成為從事國際發展服務者學習的標的與鑽研的議題，而專業上的要求，不僅使得相關從事國際發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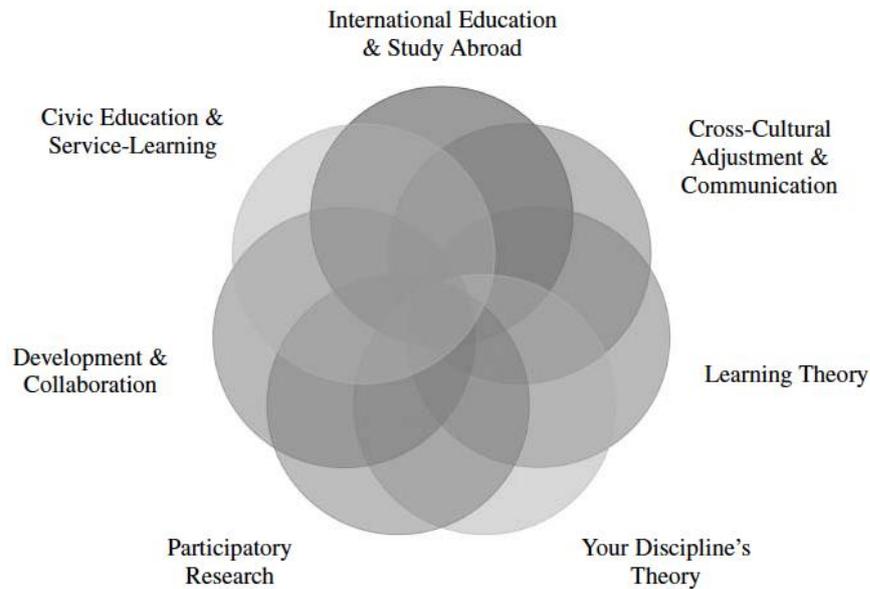
的人士重視專案成效，更將發展工作視為終身職志，在個人學期作業針對有關美國和平工作團志願服務者的質性調查訪談中，多數參加美國和平工作團志願服務者，對國際發展工作認同度高，在二年服務期滿後有相當比率嘗試返回校園修習國際發展相關技能與專業知識，同時希望未來前往國際組織從事相關管理工作，或進入政府部門擔任外交人員等。

## 國際學習服務

國際學習服務(Inter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ISL)是結合教育並以社區服務為基礎的短期跨國學習活動，在教學理論上涵括了公民與經驗教育(Dewey)、參與式教學與批判教育(Freire)和改變學習理論(Mezirow)，在理論與實證架構上，更擴及七大領域包含：

1. 國際教育與海外學習活動。
2. 跨文化調整與溝通。
3. 學習理論。
4. 從事服務項目的專業知識。
5. 參與式教學研究。
6. 國際發展與合作。
7. 公民教育與學習服務。

圖：4.4 國際學習服務理論與實證研究架構



全球教育和國際服務學習（ISL）在近來成為一種流行時尚的學術活動，儘管缺乏關於如何明確定義成功的出國遊學服務計劃，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類似項目和業務的數量一直在持續增長並蓬勃發展。但是，這種豪華的跨國教育學習服務計劃背後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難道僅僅是結合旅遊和學習？事實上學習服務活動本質是一個教育計劃，在跨國文化架構下結合學術指導、參與式學習和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換句話說，這是一項教育活動，其目的是加強跨文化意識，增強公民意識並提高全球競爭力。然而，如果未能審慎從事國際學習服務，而活動又涉及跨國的落後地區時，如果教師及學生缺乏正確的觀念，很可能導致對服務的社區與民眾有不良影響，如受服務的當地社區孩子過於崇拜或迷戀外國學生，或加深種族歧視，又或受益人視拿禮品或捐贈為理所當然，加劇社區內部分歧等等(Crabtree, 2008)。鑑於國際學習服務的性質，可能影響當地較落後的社群，

我們應該更全面分析與瞭解相關活動的安排，是否符合倫理與學術的要求，並且實際的評估其功效，而不是變成一項提供特權學生的海外旅行活動。

### **國際服務學習教育的概念框架**

Bringle, Hatcher & Jones (2011)認為，國際學習服務可以被概念化為三個主要的教育領域，包括出國留學、服務學習和國際教育。由於國際學習服務大部分是短期課程，持續時間少於兩個月，然而，研究顯示，國際學習服務太容易被看作單純有趣的活動，而忽略其對學習者與被服務者帶來的意義。因此設計和實施一個跨文化服務學習活動，有諸多難度，亟待克服，對計畫機構和教師（作為教育工作者），也必須認識到該國際學習服務計劃必須是一項學術活動，並確保服務目標和方法已得到當地合作夥伴和社區的共同認可。

### **擴展概念框架：批判性觀點和人性化的教學法**

雖然上述理論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調查國際學習服務，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原始的崇高目的：國際學習服務的本質是促進全球理解和提高世界和平(Crabtree, 2008)。因此，在活動設計上，應該注意到批判教育與人性化的教學。首先，由於大多數服務學習計劃是在發展中國家，甚至是低度發展中國家舉辦，我們更應該重視與認識到當地知識的重要性（Kirylo, 2010）。

其次，僅著重於包容和對文化差異理解的國際學習活動，無法教導學生正確認識不平等的潛在統治結構，從而導致被壓迫者陷入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因為

“當落後貧窮本身是制度的時候，制度是有問題的（Kumashiro，2001, p, 5）。

因此，通過採用佛萊雷的批判教育，能夠教導當地人對改革的認識，也給參與學生一個反思的機會。

第三，Salazar（2013）認為，服務學習可以幫助學生區分社會服務和社會變革，從而有助於社會正義的教育。教育工作者有責任通過教學和實踐，推動一個更美好更充滿正義公平的世界。因此，如何正視問題，並從中鼓勵教學和學習社會正義、和平等，教育者不可或缺的義務。每個國際學習服務活動，我們都應該詢問以下的問題：

1. 作為國際學習服務活動的組織者，我們如何為參與學生創造學習體驗，從而對當地的社區產生有意義的影響？
2. 從批判教育學的角度講，國際服務學習的意義是什麼？
3. 在跨文化的國際服務學習計劃中，我們如何通過人性化的教學法來促進社會正義和平等的概念？

## 第五章 結論

### 全球化的影響

Khan(Magu & Magu, 2018, pp. 13-14)對全球化定義:相互聯繫的經濟,政治,技術和文化聯繫日益緊密,各地的個人、社區、企業和政府發生相互聯結,此外,全球化也涉及跨國公司的成長,跨國公司和監督世界貿易和金融的國際機構,在全球化時代產生皆產生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是全球社會興起的一個綜合術語,其中世界某一地區的經濟,政治,環境和文化事件,將很快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產生意義,而資訊十倍速時代的來臨已經徹底改變我們對事物的看法,因此,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也應該與時俱進,並且作出必要的因應。重視軟實力概念便是一個改變的起點。

我們可以再一次檢視軟實力的特點:

- 一、軟實力是外交政策工具,易言之,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爭取國家利益」,除此之外,都非軟實力的應用範疇。
- 二、軟實力的定義是「透過吸引或說服,使其他國家願意配合,達到國家意欲目標的結果」。
- 三、軟實力的兩大面向:「控制議題的能力」與「塑造他人的喜好優先次序的能力」。

四、三種主要軟實力來源，包含文化、價值與政策；其他來源也包含政府、外交、文化、教育與科技革新。

軍事能力硬實力雖然仍為國際關係最後仲裁的手段，但如同核子武器保證毀滅的影響，反而是備而不用之性質，而隨著全球國際化的趨勢，作為中小國家允宜充分利用軟實力特性，發展本身外交政策特色。

臺灣最可貴軟實力，除了擁有多元文化特點外，最主要的資產在於符合崇尚普世價值的文化，此點不僅與美國主流價值一致，更成為亞洲的領航者與表率。

本文第二章分析中國軟實力與孔子學院失敗原因，即在於其相關政策並未符合普世價值，其意識型態最終仍將與西方主流文化、價值與政策產生衝突。

美國獨立宣言所揭示的理念即為西方自由主義主流意識型態：“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上帝創造者賦予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另外，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一篇演講中述及“我們是否擁有共同普世價值？”(Dec.12, 2003, a lecture by United Nation Secretary-General Kofi An-nan (2003) “Do We Still Have Universal Values?”)，在此文章中他說明，聯合國人權宣言已經被全世界法治體系接受，這些價值包含和平、自由、社會進步、平等與尊嚴(Peace, Freedom, Social Progress, Equal Rights and Human Dignity)，臺灣也身處此一陣營成員，對於人類生而平等並享有追求生命、自由與幸福的權利與理念的堅持，正是我們與中國的根本差異，亦是我們堅信民

主體制終將勝利的屏障。基於上述信念，臺灣相關對外政策均宜以「民主、平等與自由」的軟實力為評核標準。

## 教育配合全球化的努力

國際教育追求全球和平的想法，早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即有識者倡議，應推行國際教育以達世界和平理想。迄今全球教育亦多以跨文化理念，相信全球教育溝通，將為世界帶來和平。例如國際文憑組織（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於 2012 年出版“開發跨學科研究計劃”，該 IB 項目成立於 1968 年，目前已被超過 124 個國家的 1,800 多所學校採用。IB 以嚴格的評估標準創建，並以國際教育為中心的跨文化計劃而聞名，其目的在於幫助學生了解他們的文化和民族特徵，然後鼓勵他們創建一個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Fioriello, 2014）。根據任務說明，國際文憑組織的目標是“發展探究，知識和關懷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通過跨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幫助建立一個更好，更和平的世界。”IB 學習者努力成為探究者、知識淵博的思想家、溝通者，有原則的、豁達的、關懷的、冒險者、平衡的和反思的（“2012 年 IB 小學課程”）

文明演化論相信人類是一直朝向和平互助以及互相尊重的道路前進（Mesoudi, 2011），但此一過程需要藉由教育來傳承。面對不公義事件，教育無疑是最佳的途徑，也是對形塑軟實力的「文化、價值與政策」最直接與究竟的方法。佛萊雷(Freire)批判教育論述，提供了一個我們認識權力結構關係，並追求社會公

平正義的方法，而這種方法最佳的學習模式，即是由行動參與實際事件來追求。如同人性教育學學者 Yosso（2005）所構想，少數種族可以利用社區文化資產來抵抗壓迫，Salazar 博士（2013 年）也認為，敘事可以成為被壓迫者挑戰非人道的有力工具。因此，促使學生找到自己的聲音，並作為一個團隊共同努力，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文化，將可提升社群整體意識，並達成更好的人類生活目標。

佛萊雷（1997）認為教育永遠不會脫離人類的經驗。生活在公民社會中的人們永遠都不能脫離政治，特別是對於那些被壓迫的窮人或弱勢群體而言，不僅應該面對政治現實，但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挑戰它。他們主張的是我們應該關注現實，關注人類社群共同生活的空間，並站起來行動加以解決。教育學者杜威（1938），也認為教育是不是重製或預先存在的，他主張教育是通過人類理性選擇後持續行動，從而不斷形成累積的東西；行動的選擇決定了我們是誰。只有實踐才能成為真理。

黑格爾的觀點認為只有自由和自主的人，才能夠充分行使人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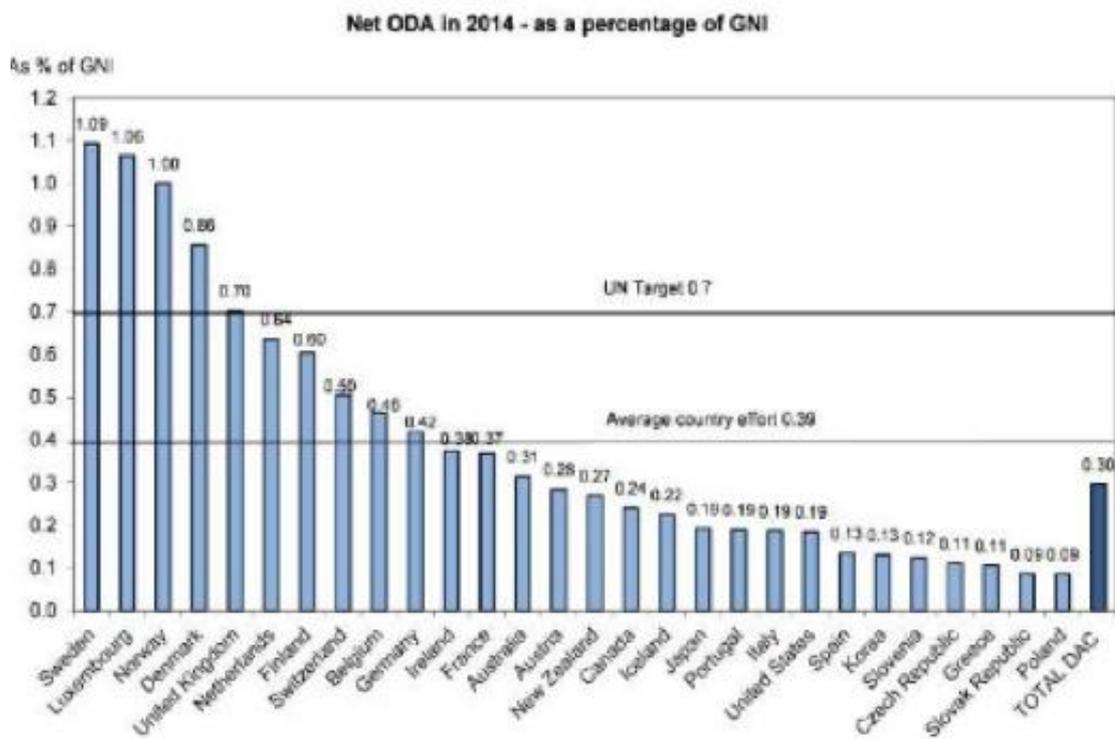
Greene（1988, p.47）指出：我們彼此聯繫，從而定義了與他人的自由，我們實現了我們渴望的親緣關係，並做出了對他人和子孫後代的承諾。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在一個社會，一個社區或一個國家內互動時，自由才存在。此外，杜威（Dewey，1938）認為，民主的社會安排可以提高人類體驗的質量（p.34），而當務之急，是認識到主流文化如何通過政治機制塑造維持不平等的意識形態，然後不斷地強調行動、反思和轉變（Freire，2000）。

那麼，現在我們需要面對什麼樣的挑戰？在 21 世紀，最富有的 1% 的人擁有全美國收入的 15%(2012)，而且這種情況正在全世界急速惡化與複製（Noah，2012 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認為，現代經濟增長和知識的傳播使我們避免了世界末日的不平等現象，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平等的主要驅動力是來自“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的趨勢所致，現在仍然持續惡化，從而在世界各個社會造成了分裂（Vidal，2016 年）。作為公民、教育者或哲學家，我們都需要找到思考如何應對這一個全球挑戰，並找到解決方案。

### 國際發展作為軟實力的策略工具

聯合國建議國際援外比率，先進國家能達到每年援助千分之 7 的國民生產毛額，我國援外經費大概只佔了千分之 1.3 到 1.4(葛傳宇，國際對外援助新趨勢與台灣模式，p. 136)，說明我國仍有努力空間，如圖：5.1 各國援外金額佔國民所得比率。而援外如果能結合國際發展與教育，將可發揮莫大綜效。

圖：各國援外金額佔國民所得比率



Rendon (2009) 建議將社區服務學習作為一種積極的沉思實踐。社區服務學習的目的，不僅是讓學生參與學習，而且還幫助他們看到希望並成為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義者（第 101 頁），而“希望”是我們每天奮鬥和努力中急切需要的東西，因此提供國際服務學習勿寧是一種良好方式與建議，應該它帶給了人們希望。

美國和平工作團起源於總統約翰甘奈迪的信念，他認為美國青年能夠協助外國發展技術能力，同時增進外國瞭解美國，也幫助美國人認識世界各國。這樣的

信念造就了和平工作團的成立，同時也成為最佳的公民外交範例。而這樣的方式結合教育與國際發展，無疑是我們應該仿效並大力推廣的項目。

最後並以和平工作團訓示為本文結語，和平工作團代表的是我們對社會最可貴與崇尚的價值，它代表的價值，是美國所追求的一切，也具體呈現了所我們相信應該在世上所追求的所有理想。

“The Peace Corps represents some, if not all, of the best virtues in this society. It stands for everything that America has ever stood for. It stands for everything we believe in and hope to achieve in the world.” (“Roles of the volunteer in development: Toolkits for building capacity.” n.d. p.4)

## 附錄 參考書目

- Brown, Eleanor J. (2015). Models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for social justice: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f non-form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in Britain and Spain,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5:1, 141-162, DOI: 10.1080/03057925.2013.841469
- Chung H. Governmentality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ICT. 2015.
-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 Hanban ) . (n.d.).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hanban.org/>.
- Dewey, J. (1938).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Kappa Delta Pi lecture series; 1938).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Freire, P. (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anniversary ed.). New York: Continuum.
- Flinders, D. J., & Thornton, S. J. (2013). *The curriculum studies reader* (4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 Fioriello, D. P. (2014, March 02). Pros and Cons of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Program. Retrieved May 02, 2017, from <http://drpfconsults.com/pros-and-cons-of-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program/>
- Greene, M. (1988). *The dialectic of freedo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Gardner, Katy and David Lewis. 2015.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luto Press. Chapter 5: "When Good Ideas Turn Bad" The Dominant Discourse Bites Back, p. 150-176.
- Haidt, J.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 Jonathan Haidt. (1st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Hazelton, J. (1912). WHO WROT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Times* (1857-1922), p. SM12.
- Kothari, Uma. 2005. Authority and expertise: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ordering of dissent. *Antipode* 37.3: 425-446.
- Nye, J. (2004). *Soft power :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1st e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Noddings, N. (1995).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Dimensions of philosophy ser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Noah, Timothy (2012). *The Great Divergence: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Could*

*Destabilize the U.S. So Why Isn't Anyone Talk about it?* In Anderson, M. L., &

Collins, P. H. (Eds.), *Race, class, and gender: An anthology (9th ed.)* (pp.

110-112).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Open Working Group proposa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d.). Retrieved

November 20, 2017, from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proposal.html>

Parthasarathy, Balaji (1994) *Marxist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Third World Berkeley Planning Journal* 9-pp.

109-124.

Primary Years Programme. *Developing a transdisciplinary program of inquiry.* (2012).

Retrieved May 02, 2017, from

<http://docplayer.net/26417585-Primary-years-programme-developing-a-transdisc>

<iplinary-programme-of-inquiry.html>

Popovic, P. (2011). *The Future of Power.* *Politicka Misao*, 240–243.

Magu, S. M., & Magu, M. (2018). Peace Corps and Citizen Diplomacy: Soft Power Strategies in U.S.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du/detail.action?docID=5295152>

Pinar, W. F. (1995).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urriculum discourses / William F. Pinar ... [et al.]. New York: PLang.

Ramalingam, B. (2013). Aid on the edge of chaos: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complex world / Ben Ramalingam. (First edition.).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les of the volunteer in development: Toolkits for building capacity.. (n.d.).

Retrieved November 29, 2019, from

[https://du-primo.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UODE\\_ALMA21760521770002766&context=L&vid=01UODE\\_MAIN&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_scope&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default\\_tab&query=any,contains,the%20roles%20of%20the%20volunteer&offset=0](https://du-primo.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UODE_ALMA21760521770002766&context=L&vid=01UODE_MAIN&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_scope&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default_tab&query=any,contains,the%20roles%20of%20the%20volunteer&offset=0)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99).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5(4), 1455–1457. <https://doi.org/10.2307/2568266>

The Blog of Dr. Paul Michalec. (n.d.). Retrieved January 24, 2019, from <https://morgridge.du.edu/blog/blog-dr-paul-michalec/>

Vidal, Matt (2016). Inequality and the growth of bad. In M.L. Andersen & P. Hill Collins (Eds.), *Race class and gender: An anthology* (pp. 270-272).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2013)

West, C., & Ebrary, Inc. (1989).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 (Wisconsin project on American writers).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elker, Marina. 2012. The Green Revolution's ghost: Unruly subjects of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in rural Indone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39(2): 389-406.